

研究論文

考古人類學刊・第 92 期・頁 71-124・2020

DOI: 10.6152/jaa.202006_(92).0004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 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黃舒楣*、張皓鈞**

摘 要

過去二十年來，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成為普世認同的重要人類經驗，學界以之探討「普世化記憶」與襲產全球化的相關互動，延續此對話，本文以近年上海虹口建置猶太難民紀念館以及相關後續準備申遺工作為起點，探索其所在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存實踐。本研究企圖理解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之劃定和後續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近年虹口區推動「上海方舟」之操作，轉向世界記憶申請，嘗試以猶太難民記憶提煉出普世主義的現代氣息，以突破其邊緣鄉里的相對發展落後。關注上海猶太難民記憶，如何於近年得到重視而襲產化（heritagization）之過程，嘗試具體回答以下問題：猶太歷史蹤跡的襲產化過程如何發生於異地（上海提籃橋）？驅動襲產化的主要動力為何？猶太難民記憶襲產化過程相關的襲產論述實踐如何在跨境協商和跨領域競爭中展開？遇到哪些保存困境？戰後多年來落腳提籃橋一帶的居民日常處境如何受到襲產化過程影響？本文兼採襲產規劃文本分析、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研究，梳理起自 2000 至 2020 年的襲產化轉向動態，並結論指出動員普世化記憶之不易，同時，居民對於保存動遷的渴望，加深了他們在此襲產化過程中的疏離窘境。

關鍵詞：記憶轉向，世界記憶，上海猶太人，普世化記憶，襲產化，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E-mail: shumeihuang@ntu.edu.tw。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E-mail: mmonsterwwwtw@gmail.com。

The Memory Turn in and the Cross-border Negotiation over the Making of Jewish Heritage in Shanghai: Cosmopolitan Memories, Heritage Diplomacy and Urban Spatial Politics

Shu-mei Huang^{*}, Hao-chun Chang^{}**

ABSTRACT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growing recognition of making holocaust memories a key in pursuing cosmopolitan memories in cases across borders. Existing literature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osmonostalgia as related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heritage. In light of this, we try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Jewish Refugee Museum and attempt to register stories of the Shanghai Jews as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lanqiao Historic Cultural Preservation District, Hongkou,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e Hongkou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omoting Tilanqiao as “Shanghai Ark,” turning away from pursuing World Heritage towards Memory of the World and in so doing to re-articulate Hongkou as a modern cosmopolitan hub. Focusing on such an ongoing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of Jewish heritage in Shanghai,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has the process of the heritagization of the Jewish heritage in Shanghai taken place and what is the drive for an initiative as such? How has heritage preservation as discursive practice been carried out to mediate the related cross-border negoti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as a result? How has the process of the heritagization of the Jewish heritage in Shanghai left impacts o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Tilanqiao residents? Adopting content analysis of heritage planning documents, in-depth interview, and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turn to Memory of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onclusion, it presents the challenges of mobilizing cosmopolitan memories and moreover,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which local residents further alienate themselves from the politics over heritage for their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umeihuang@ntu.edu.tw.

^{**} M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monsterwwwtw@gmail.com.

aspiration for relocation by preservation.

**Keywords: memory turn, memory of the world, Shanghai Jews,
cosmopolitan memory, the Tilanqiao Historic Cultural
Preservation District, Heritagization**

一、從世界遺產到「世界記憶」？

2020 年二月起，全球各地因新型冠狀病毒防疫紛紛關上邊境大門，來自疫情最為嚴峻的中國旅客首當其衝，二月起，以色列跟進歐美多國，發布禁止中國遊客以及 14 天內曾入境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以色列，同時暫停往返中國與以色列的商業航班。對此，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臨時代辦戴玉明二月二日在記者會上提出嚴詞聲明，表示此舉讓他回想起二戰期間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難民潮屢屢碰壁，上海是少數猶太難民得以暫棲安身之處，救援了至少兩萬多名猶太難民。此言一出引起爭議，中國大使館隨即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強調並非有意將大屠殺類比本次防疫禁令（Peleg 2020; Steger 2020）。其實這並非中國官員首次隱喻失當，2019 年曾有中國官媒類比香港反送中運動抗議者為納粹，已引起不滿。再次隱喻失當成為疫情中不快插曲，凸顯歷史記憶可隨時為當下動員而引發新的政治效果。本文正要分析這段少為人知的上海猶太難民記憶，如何於近年得到重視而襲產化（heritagization）¹ 之過程，且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猶太襲產的襲產化過程如何發生於異地、名為提籃橋的地區？驅動襲產化的主要動力為何？猶太難民記憶襲產化過程相關的襲產論述實踐如何在跨境協商和跨領域競爭中展開？遇到哪些保存困境？戰後多年來落腳提籃橋一帶的居民日常處境如何受到襲產化過程影響？

本研究所在的上海虹口區位處黃浦江北岸，與黃浦、盧灣區同屬城市競爭之開發後進，雖為國際租界一部分卻不屬於舊上海市中心，更接近老上海人認知的郊區「小城」——作為大都會之「未完成」狀態（黃宗儀、董牧孜 2017）。近年來，中國城市化競逐催生了明星大都會與「小城」之二元對立，黃宗儀和董牧孜（2017）深入分析「小城青年」作為流行詞彙，如何將等級化的地域身分轉換為關乎格調與品味的象徵符碼，指出多數中國城鎮現實是更為接近鄉土中國的「小城」，然多數主流認知忽略了大都會的異質性。摩登上海外圍的虹口，即使曾有國際租界驅動聚落發展，其都市狀況仍迥異於流行認知的法租界繁華或外灘風情。虹口區近十年不到才有音樂谷、白玉蘭廣場等項目（Martínez 2017; Pendlebury et al. 2017）。在虹口，一來發展策略鋪展得晚，繼承的歷史建築群數量多，但官方未必有完整保存規劃來定位為數眾多的里弄建築。再者，虹口區歷史建築群多作為「老公房」使用多年，未於上海世博前更新者，在十年後上海房價翻倍之際，動遷補償規模倍增，若無私部門主導難以推動。然此區相關國際租界歷史及跨國戰爭記憶競合，使其保存再利用發展不如新天地明確可行，投資者紛紛卻步。襲產的政治經濟與外交政治交纏下，虹口區的歷史建築保存不一定是好生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意，這些在既有研究中較少探討。

在前述背景下，本研究企圖理解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之劃定和後續十五年來的發展。近年虹口區推動「上海方舟」之操作，似有意透過世界記憶申請，來正當化上海觀點的歷史詮釋，行「實相登錄 (register of reality)」之功。初步看來，虹口區嘗試以猶太難民記憶提煉出普世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現代都會氣息，借用過去寓居於此的德、奧、俄等猶太居民生活文化和品味，以突破其鄉里現況—尤其是霓虹燈外的提籃橋一帶。提籃橋監獄旁的舟山上有不少居民直接曬衣於監獄高牆一側，對面的小店多為工人民生服務所需，間雜著幾間販售蟋蟀的小店，多標榜自河北滄州，暗示此處出入的悠閒男性蟲戲社群和認同劃界。相較十里洋場的上海，過去屬於「下只角」的虹口區多蘇北人的歷史背景，鄉村氣息始終濃厚，當然也難逃上海長期對於蘇北人的文化歧視 (Honig 1992)，蘇北底氣不難見於街市。東餘杭路的蘇北特色菜除蘇北丸子之外，在提籃橋臨潼路上更有「鹽阜特產上海經銷總店」，老闆夫妻兩人都是蘇北人，來到上海打工三十年後退休開個小店，店內盡是蘇北農家物產。這些小生意人所理解的提籃橋也不是那個鑲嵌於歐陸戰爭歷史、猶太難民搬遷軌跡的國際城區，而是「北外灘以北」，城市邊緣的邊緣。居住在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內的這些人們，對於人行道鋪面隨處可見的「上海方舟」字樣不太清楚。筆者曾在舟山路上隨機請問居民，他們滿臉狐疑，各自猜想答案而摸不著邊際。整體來看，提籃橋監獄周邊的日常景觀，和虹口區嘗試以猶太難民記憶提煉出普世主義的都會氣息有段不小差距。

本研究針對歷年來的保存規劃報告書和虹口區規劃策略進行內容分析，以掌握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存規劃演變，輔以深入訪談當年參與保存規劃的關鍵專家。針對居民部分，則採都會民族誌式的田野觀察，輔以隨機訪談以及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期間起自 2018 年七月至 2020 年二月共二十個月。本研究團隊並非來自上海，研究得以啟動乃受惠兩位上海學者友人，其一協助聯繫當地歷史學者，其二本身成長於提籃橋，透過其母親協助推薦鄰居舊識，團隊得以進入提籃橋一帶里弄走訪，然本研究主題涉及空間政治及歷史詮釋，除少數例外，本文書寫涉及之引用皆採匿名。每回田野調查由一至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進行共四次調查²，探討提籃橋地區之襲產化過程如何在不同尺度的政治經濟上作用？此外，居住於風貌區內的人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領域為襲產概念所重新詮釋？

二、相關理論：猶太襲產的普世主義效果以及世界記憶政治

以下回顧虹口案例中最關鍵的猶太襲產近年如何成為普世主義推動之工具，以及「世界記憶」所鑲嵌之襲產政治、襲產外交相關研究。

（一）猶太襲產與普世主義鄉愁（cosmonostalgia）

記憶研究近年追溯 1970 年代起於德國和美國的「大屠殺紀念熱（The Holocaust Boom）」，指認普世化記憶（cosmopolitan memory）之形成，如同自發的全球化（internal globalization），宛如由下而上的記憶全球化，地方主動尋求跨域、跨尺度共享集體記憶相關的襲產認識和道德政治重塑（Levy and Sznajder 2002）。在此過程中，受害者和加害者之分野不再清楚，也不若往日重要，取而代之的乃普世化共享、展望未來的宣示「不再重蹈覆轍（never again）」。襲產研究學者 Sharon Macdonald（2013）指出有關「普世化記憶」與襲產全球化的相關互動，涉及記憶的去領域化以及再領域化的動態，帶動更複雜的共作或操弄可能。

大屠殺記憶和襲產化工程方興未艾，部分學者開始更為批判性地指出這過程同時不乏排除意味：右翼政治推動視猶太人存在為「歐洲化」關鍵構成，其看似包容納入猶太社群代表的他者為我群，但持續地在普世主義排場內裡藏有深深的「他者焦慮」，此中所追求嚮往的「歐洲」並非如其普世主義宣稱衷心開放，反而像是堡壘陣營的「歐洲」。例如 Matti Bunzl（2003）分析奧地利經驗，自九零年代起，猶太人在奧地利成為排外時格外好用的存在，以之顯現的族裔包容來掩蓋其他的排除，也就是用以掩飾當地社會其實持續地排除伊斯蘭社群、非洲移民（Bunzl 2007, 2005）。Mandel（2008）則以歐洲經驗如何面對移民為例，深入分析所謂普世主義中內蘊的深層焦慮。Macdonald（2013）比較各國重置、修復國族論述與猶太人文化的策略，進一步指出各國趨向工具化普世主義，浪漫化地建構二戰前的普世過往，滿是鄉愁，同時難免重構族裔、文化階序，有時顯示於族裔之間的差異化對待，或顯示於城鄉差距的二元理解，簡化假設都會生活才能孕育開放的普世主義，而落後的郊野鄉間則保守封閉。

（二）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之保存困難

困難襲產在東亞的脈絡中，論及保存實踐仍相當困難，尤其是困難襲產相關的二戰歷史爭議，糾結著戰後東亞各國的專制政權近年才陸續民主化的進程，國際與國內政治歷史糾結難解（Huang and Lee 2020）。另一方面，襲產保存的實踐在東亞各國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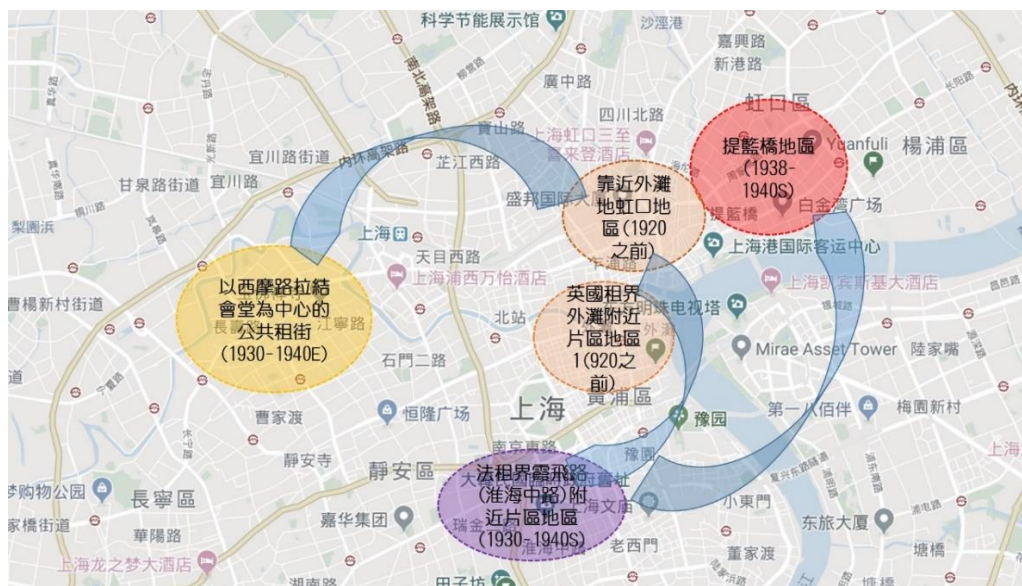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深受歐洲觀點的全球化襲產治理政權及專業影響，尤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引領的保存體制，而在此過程中，全球申遺競賽的複雜效應，以及 Sharon Macdonald (2013) 指出西方保存體制「尋找好案例 (the search for good case)」的慣性，往往不會優先考慮困難襲產，因其相關記憶爭議難有共識，操作起來相對耗時且棘手。

此外，襲產保存的務實主義和形式主義，如何在空間化工具操作過程中，重構甚至錯置了歷史記憶效果，持續是實務推動之挑戰。歷來，結合文化資產保護和都市設計，以片狀街區進行保護性的風貌控制和紋理保存，好像是理所當然，各國都行之有年，藉此取代單棟建築物的點狀保護，本意良善的操作背後是濃厚的務實主義和形式主義。推動有年之餘，都市計畫工具主導的圖繪管控偏重特定土地區劃，有可能造成了歷史記憶的重構甚至是錯置，然而始終欠缺檢討。

Napong Tao Rugkhan (2015) 以曼谷的歷史區拉達那哥欣 (Rattanakosin) 老城區為案例，結合了批判製圖學 (critical cartography) 和歷史保存研究，指出繪圖背後的權力幾何學，檢視都市計畫常用的土地分區及歷史保存中賦予不同文化資產重要性層級如何共同重構了歷史地景的記憶，甚至造成了雙重誤解：拉達那哥欣從來都不是同質均勻的歷史街區，該地方也從來不是曼谷歷史的中心。然而，因拉達那哥欣之外的曼谷已歷大規模的發展改變地景，多年下來的歷史記憶錯置也就嵌入了地方新貌，遊客如織來來去去也就視之為「原真歷史」。類似效果也見於上海提籃橋地區，當年的上海猶太人飄散流移網絡極其複雜，從時間和空間來看，其城市生活範疇遠大於後來日軍占領時所制定的隔都範圍 (參考圖一、圖二)，而所謂的上海隔都範圍其實也遠大過於保存區面積。然而，隨著保存區的劃定以及「上海方舟」主題的提出，透過歷史保存所重構的歷史性 (historicalness)，如同布希亞所言，同時慶賀擁抱歷史和拒絕歷史 (前者往往掩蓋了後者) (Baudrillard 2003: 74, 轉引自 Peleggi 2005: 261)。

換句話說，在襲產保存實務中行之有年的區劃、某程度繼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控制想法的作為，其涉及的歷史化過程、地理圖學化過程，並非不證自明的真理。Rugkhan (2015) 指出歷史保存可重新理解為一「繪製歷史性的動作」，彷彿呼應 Handler (1987) 稱呼的「歷史封鎖線」，而歷史建築、場址或歷史保存街區，都是襲產政權控制的領域，透過地圖來施以精密操作 (Rugkhan 2015: 872)。類似討論亦可見於 Jenkins (2009) 針對檳城喬治市的深入分析 (The Historic Enclave Action Plan 1997)，提及九零年代由馬來社群為主，動員澳洲襲產專業來劃出以阿齊街清真寺為核心的保存區，反映特定歷史性如何形成於圖紙區劃。



圖一 二十世紀上半葉猶太人在上海的遷移軌跡
(本研究根據《空間·故事·上海猶太人》頁 9 重繪，底圖來源：百度地圖)

困難襲產兼具多重襲產特質，苦難發生地點之有形襲產，及充滿傷害、暴力的暗黑記憶（不完全但某程度可為檔案襲產所維繫），而其保存不易，往往在於有形襲產及檔案襲產這兩種襲產化過程有可能相互消滅。首先，猶太難民相關建築物群的價值究竟怎麼討論？其價值是有形遺產的建築美學價值、還是流離記憶？這部分涉及了戰爭記憶印記的本體論（ontology）檢視，也就是說，檔案遺產或稱「記憶遺產」究竟是什麼？嚴格說來，「檔案」就其原意發展也就是指稱相關承載記憶的文件或書冊，但涉及「記憶」則難免涉及為人所感之記憶因而具有主觀可變性，還是強調「見證」性質而納入了記憶中的場景、建成環境，因而又更趨近有形遺產？如果理解戰爭印記呈現於城區人口的歷史性流動而非建築物，那麼若仍執意以有形襲產為尊的保存策略，往往會讓保存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忽視歷時累積而成的「當下」，尤其是後到居民歷年來如何困難地面對居所而不自得。由於特定過往記憶和早已不在場的城市過客被凸顯強化，反而使現況居民成為歷史街區的陌生人—不被期待要長居久安者。困難襲產中難以落戶安身的處境，就像 Leutloff-Grandits (2006: 117, 122-3) 所描述之戰後難以安心的克羅埃西亞居民。

再者，困難襲產相關歷史背景多戰爭和政治衝突，矛盾核心之一在於領域主權競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爭，因而困難襲產相關的「襲產外交 (heritage diplomacy)」和治外襲產 (extra-territorial heritage) (Beaumont 2016)，所涉及的襲產再領域化議題更為艱難敏感，尤其在東北亞中日韓之間的爭議歷史明顯可見，此處我們引介有關「襲產主權」(Wang 2019) 的批判性討論來協助突破既有討論認識。Wang 以 John Agnew (2005)「具備實際效力的主權 (effective sovereignty)」來建構關係性的主權詮釋為啟發，突破完整領域性對應的疆域主權想像，延伸來鬆動襲產對特定完整主權領域的制度性認識。Wang 以絲路系列申遺為例，建議理解「襲產主權實踐如網絡」，而網絡中各節點滿是權力矛盾。其分析指出我們需更重視跨境的作用者互動，如何形成於菁英及特定利益團體、公民社會之間，從更為「人性具象化的敘事 (a “peopled” account of political authority)」(Kuus 2020) 來理解政治主權究竟如何實踐於特定襲產主權實踐網路節點、特定地理政治空間，或者說，政治主權實踐如何散落藏身於不同具體實踐中，在不同的過程中動員「領域」。借用其有關「關係性的襲產主權 (a relational heritage sovereignty)」(Wang 2019) 之分析，或能藉由猶太襲產的散落各主權國家如何反應了其社群離散特質，更進一步去質問「主權」和襲產構成的耦合性 (coupling)，以及「世界遺產」預設的主權國家參與及規章制定，是否難以對應猶太襲產之離散存在，其歷史過程和其未來恰恰是持續作為主權交鋒、跨國記憶論述競合的前線？

(三) 從世界遺產到世界記憶：東亞記憶競爭、襲產去物質化的過程？

世界各國熱衷於競技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已引發諸多學界重視與批評，同時，世界遺產給各會員國設定的提報名額限制造成國際、國內排序的提報競賽 (Meskell 2014, 2015)。學者屢屢提醒，所謂「共享襲產」乃一建構 (González 2014; Lowenthal 1998)，由越來越多案例可見，襲產建構已然成為各國追求全球化過程的工具性過程，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項目逐漸成為此過程的重點戰場。在此脈絡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計畫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 近來成為新的焦點。世界記憶計畫自 1992 年起，進行登錄及相關保存實踐等例行作業。以適當技術保存檔案襲產，增進全球對於相關檔案襲產的重視和理解 (Abid 2011)。其創設重要背景之一，乃教科文組織在 1990 年設置了新部門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cs (CII)，後來改稱 CI)。而世界記憶計畫就是此部門的重要計畫，近來曾有討論提出是否要整合事務，將世界記憶調整為文化部門所管，持續遭到 CI 部門資深主管的反對 (轉引自參與世遺會議的專家私人信件溝通，2020/01/30)。雖然部門競爭隱然驅使著項目分野，不過 1992 年世界記憶創設之始正是世遺項目創設二十週年，同年成立世界遺產

中心，專家認為，這個攸關世界襲產的時機對於世界記憶創設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Jordan 2013: 9）。無論如何，有關於項目之命名，「記憶」是一開始就提出的，因當時主導者強烈意識著這個計畫的目標是要對抗「集體失憶（collective amnesia）」。

世界記憶登錄操作起自 1997 年，該年完成三十八件，隨後每兩年增列登錄。值得注意的是，為數一半屬於歐洲，反映於前一二名乃奧地利與德國，同時來自亞洲的南韓名列第三（共十六件登錄，其中包括光州事件相關文件）。亞洲的參與發展較為晚近，2003 年之後才顯著提升（Heaney 2016）。至 2017 年最近一次登錄為止，中國仍略遜韓國，共十三件登錄，其中最為知名爭議是 2015 年的南京大屠殺文件（Suh 2020）。甚至我們可說，近年因數件爭議性案例而引發了全新關注檔案襲產（documentary heritage）的熱潮（Heaney 2016; Nakano 2018a, 2018b），由關注慰安婦權益的十九個團體共於 2016 年正式提出的登錄申請，至今仍因日韓雙方不同史觀而處於爭議協調狀態中。³ 部分學者甚至稱之為世界記憶的「武器化（weaponizing）」（Boyle 2019）、「歷史之戰」（Suh 2020）。

上述事件引起了檢討世界記憶作業程序的撻伐，目前為止，世界記憶之提報流程不需經過各國政府，這作法引起了某些國家的疑慮，甚至是反對意見（Nakano 2018a, 2018b）。「世界記憶」之操作，在近年學者不同的經驗研究中看來，同時促成了對立性的普世主義（antagonistic cosmopolitanism）（Boyle 2019）和看似更具無爭議性普世價值但又不無浪漫性、焦慮的「普世主義的鄉愁」（Macdonald 2013）。在此兩種傾向同步展開之際，各國之間似乎展開新的競爭，而中國近來對於檔案襲產的重視，顯現於其力爭設置世界記憶計畫學術中心。⁴

世界記憶登錄的初期辯論核心其實具有存在論意味，有些學者堅持，數位化保存其實不等於保存原件。就文件襲產的價值及保存理論上，則持續有學者提出擔心援引物質襲產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原則」的必要性和適宜性（Sloggett 2005），省思重要性論述實踐中內化的偏重階級和層級而難以避免排除效果。由此可見當前實踐隱藏著挪用「世界記憶」為世界襲產新類別的誤解。而且世界記憶計畫的操作，似乎有潛力讓城市逐漸由世界襲產潛力點轉變為世界記憶的展場。其重檔案的本質，又似乎賦予更多相關建成環境的改編彈性、保存真實性課題也不再是關鍵核心，反而需要更多展示讓記憶得以現形顯影。

總之，世界遺產、世界記憶兩者之間相關又相異的性質在概念和實務上打開了些未能釐清的曖昧操作空間，正是本研究意欲探討的重點。以下解析提籃橋地區的襲產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化過程，如何由物質襲產走往文件襲產的近年轉向。

三、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形成、保存困境與轉向

（一）猶太人逃難歷史和提籃橋監獄的偶然並置

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過去稱華德路監獄，Ward Goal，昔日華德路上，今虹口區東部長陽路 147 號)，由上海國際租界工部局建造管理於 1903 年，一度譽為遠東最大監獄，落成至今是提籃橋地方的重要地標。有一說認為「提籃」之名和另一重要建築下海廟有關，來自香客提籃過橋的景象。由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張上海舊地圖(圖二，標記日期為 1904 年)可看到當時此區幾無發展規劃，唯有標出監獄、公共市場、下海廟還有一間警察局(紅色虛線標示部分)。



圖二 提籃橋地區規劃，取自上海都市計畫 (Waterlow and Sons 1904)

(圖片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Digital id: <http://hdl.loc.gov/loc.gmd/g7824s.ct003858>)

提籃橋地方乃昔日上海公共租界東區，2003 年之後上海市劃定有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占地面積共二十九公頃。⁵ 東以保定路—長陽路—臨潼路為界，南界為楊樹浦路，西界為海門路，北界為昆明路—唐山路—舟山路。其中包括提籃橋監獄作為重點

保護建築，還有大片保護歷史建築，多屬住宅群，今日多數人對於此區建築的認識來自所謂「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見證戰前上海一度為世界上唯一不需簽證和任何財力保證即可進入的港口城市(王健 2008)，不過那短短幾年的國際政局變化迅速，相關移動歷史相當複雜，需更仔細說明如下。

1937 年之後的上海多半已為日軍占領，然日方來不及建立完整對外事務制度，中國政府當時幾乎沒有主導權，沒有單一國家能管控港口的特殊狀態，相較國際紛紛收緊邊境，反而成為優勢，持續有來自各地的難民來到上海，尤其是逃離歐洲的猶太人，多於水晶之夜後⁶，於 1938 至 1941 年間抵達，1939 年多達 12,089 人(Ristaino 2001)，估計至少兩萬名大批逃自中歐、東歐與俄國的猶太人。歷經了 23 至 72 天的長程旅途後，大量難民中僅有三成能自主尋找落腳處，其他多仰賴上海的猶太社群相關安置機制，搭著救濟巴士來到了虹口(ibid.)。⁷為什麼是虹口？原因之一是 1937 年之後的戰事轟炸讓虹口不少原居民出逃，留下大批閒置房屋，相較上海他處居住成本更為低廉—租金較英美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便宜至少七成(奧尼爾 2018)因而安置門檻相對低。同時，戰前已於上海成立的眾多猶太社群，以及發跡多年的沙遜家族(Sassoon)和嘉道理(Kadoorie)家族都沒有坐視不管難民，如維克多·沙遜和 Paul Komor 建立之歐洲移民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 IC)，嘉道理創辦的援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Assistance of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CFA)都在猶太難民逃離及安置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不少援助(Malek 2000; Ristaino 2001)。如前所述，救援行動剛好銜接 1931 年與 1937 年兩次中日淞滬會戰之後居民逃逸後閒置的土地和房屋，IC 和 CFA 在虹口準備了房租較低廉的房屋，以及利用六所學校改建難民營收容大部分抵滬難民(張艷華、王健 2011; 奧尼爾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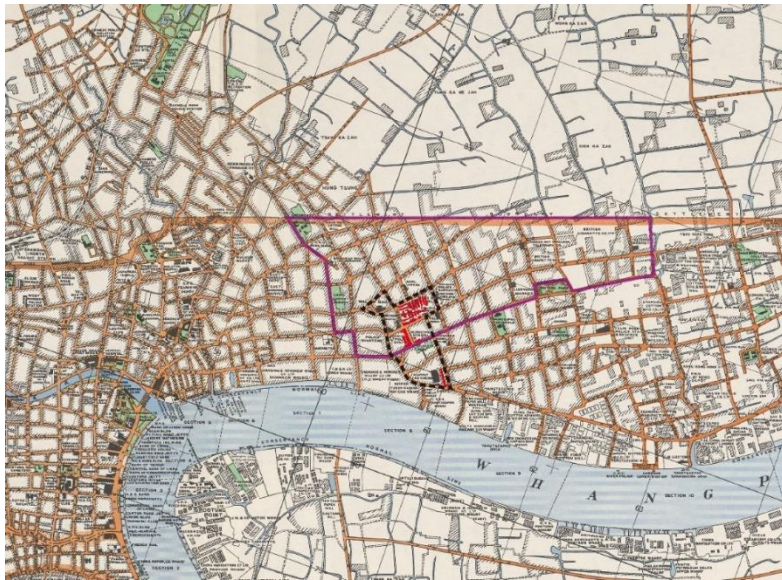
上海日本政府將德國猶太人視為無國籍者。德日聯盟成形後，因應納粹施壓(當時德國駐日代表 Josef Meisinger 上校的介入希望實施最終解決方案，奧尼爾 2018: 119)，考量國內外可能的反對，日本沒有採納，不過到了 1942 年十一月日方終於施予管制，而「隔都」之名就來自於日人劃設的無國籍難民隔離區，跨越了今日的部分虹口區域，以及部分的楊浦區(Ristaino 2001，參考圖三)。日方要求所有在 1937 年之後抵滬的無國籍難民(尤其針對來自德奧的猶太人)遷入隔離區，在接近一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雖無圍牆阻絕，但予以保安維管，出入需要出示通行證。

隔離區約包含有十五個街區，包括今日的霍山路、長陽路一帶。今日的霍山路 119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號、121 號，是一幢三層西洋建築，即為當年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簡稱 JDC）駐滬分支機構所在地。今日的長陽路 62 號（原華德路 62 號）是猶太摩西會堂，摩西會堂建於 1927 年，二戰期間成為上海猶太難民的宗教活動中心。此外，舟山路及霍山路一帶也留存不少英國安妮女王時期建築風格的住宅，曾聚集大量猶太人，有「小維也納」之稱。此區中的霍山公園（彼時霍山路稱匯山路，公園便名為匯山公園）是難得開放空間，正處隔離區中央，成為當年猶太難民的主要休閒集會場所。當年因日軍控制猶太難民行動，許多猶太孩子們唯一的遊戲空間就是這小小的公園（Eber 2008; Heppner 1993; Tobias 1999）。



圖三 「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 示意圖。紫紅線為隔離區範圍，北為當時公共租界北界，西為今丹徒路（Dent Road），南為霍山路（Wayside Road），東為蘭州路。然有些網路圖資顯示，範圍可能有更向南及東擴張。黑色虛線為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範圍（參考圖四）(本研究重繪，參考 Ristaino 2001，底圖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4s.ct003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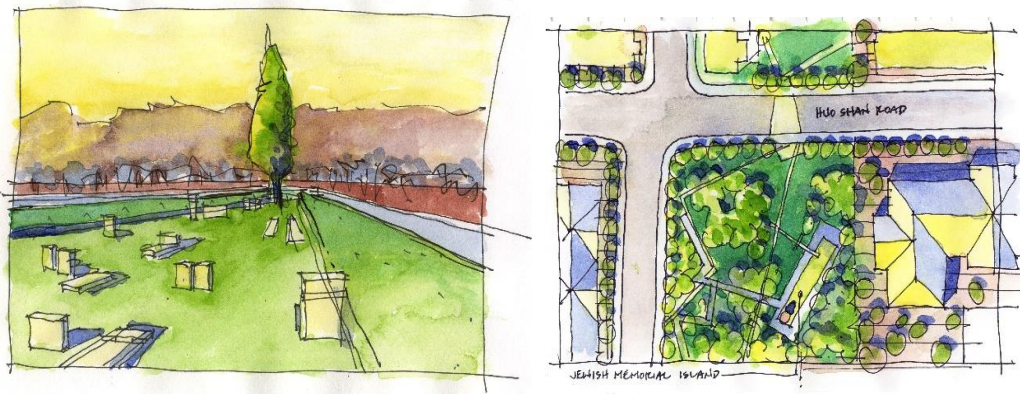
二戰結束後，租界撤銷與國共戰爭等因素下，多數的猶太人遷移至美國、以色列、加拿大、澳洲、巴西、紐西蘭等國家，鮮少留在中國繼續居住。國共戰爭期間，由於戰亂、租界瓦解等因素，加上私人公司與中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悖，沙遜與嘉道理家族將經營重心移往香港（劉曉航 2014）。1960 年代過後中國猶太人社群幾已不復存在（王健 2008）。因此，猶太文史在中共建政之後出現真空期。而隨著 1979 年改

革開放與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龍頭城市，再度開放外國人在中國活動。加上 1992 年中以建交，持續吸引猶太人赴中經商，上海猶太社團中心也於 1998 年成立。猶太人在中國的文史考掘才在這個背景中獲得契機，如 1987 年上海社科院成立猶太研究中心，此外外國猶太難民後裔的研究與口述史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如 1976 年大衛·柯蘭茲勒 (David Kranzler) 出版《日本人、納粹與猶太人：上海猶太難民社區，1938-1945》等等 (張艷華、王健 2011)。猶太難民抵達以及離開上海的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這個城市曾經的特殊狀態、處於國際之間但沒有單一國家能完全決斷其對外事務，因而當後人回頭希望論述「是誰」對猶太人伸出援手時，其實沒有清楚或唯一的答案。把握這點，我們也才能理解當代上海或中國政府希望去保存這段歷史記憶以及相關襲產時，透過制度性保存實踐所直接、間接伸張的襲產主權，其實帶有爭議。針對這一點，上海當地的歷史學者甚至曾私下表示：「真要說起來，這功勞應該是日本人的，未必是中國人的，畢竟當時主導上海的不是中國」(訪談楊華年，2018)。

(二) 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定 (2002-2004)

且不論歷史論述爭辯，上海隔都的歷史重要性在近年得以彰顯，民間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亦不容忽視。2001 年以色列記者 Dvir Bar-Gal 在友人引介下，意外在古董店發現兩塊刻有大衛星的猶太人墓碑，經過一連串追蹤，他在上海徐涇鎮發現了一大批被充當地板鋪面的猶太墓碑。隨後 Bar-Gal 尋求以色列駐上海領事館的協助，促使提籃橋地區的保存議題浮上檯面。然而，歷史記憶的保存並非發生於真空，2002 年，「浦江兩岸綜合開發」計畫啟動，北外灘地區被賦予國際航運商貿、商辦大廈、濱江休閒等機能，對舟山路、霍山路一帶猶太文史相關建築產生更新拆除的開發壓力。同時，有些猶太裔人士為了爭取更多保存而奔走。有兩位猶太裔加拿大人 Ian Leventhal 和 Thomas M. Rado 發願募款保存至少五十間猶太難民建築物 (跨越九個街廓)，一度組成「生命之橋 (Living Bridge)」公司作為推動事業體。他們在摩西會堂舉辦「友誼之禮」藝術展，提出四平方公里的猶太難民生活中心修復計畫，獲虹口政府關注 (Jackubowicz 2009)。

在民間人士奔走、外交機構運作以及襲產專家協助下，2003 年上海市規劃局以下海廟、摩西會堂、提籃橋監獄等建築為核心，劃定了二十九公頃的「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圖四)，並委託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阮儀三團隊進行保存區規劃研究，同時進行「百路優化」等違建拆除與建築翻修工程。曾經，於 2004 年，Bar-Gal 與建築師 Christopher Choa 以「鐫刻出的歷史—上海猶



圖五 建築師 Christopher Choa 的方案
(圖片來源：Christopher Choa 提供)

整體來說，提籃橋的建築典型性不凸出且環境狀況一般，但由於猶太難民歷史意義受到外國重視，加上規劃師與建築師針對北外灘開發計畫拆除提籃橋建築的質疑，催生了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定（張艷華、衛明 2007）。參與關鍵過程的專家阮儀三指出（訪談，2018/10/19），當時以色列或猶太裔團體非常關注提籃橋地區的正面意涵，他們認為，相較其他地區大屠殺或集中營等負面襲產，上海提籃橋的猶太難民文史宛如「生命方舟」。正因為國際之間的關注甚至介入，提籃橋風貌區的保存因而不完全等同於其他風貌區案例，有其涉及對外事務、由他人歷史詮釋目的來影響我群如何看見的特殊性。

（三）遲滯不前的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以及上海歷史保存體制變遷

制定約十五年後，提籃橋風貌區內的建築群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也沒有保存專業規劃期待的修復與整治，實際走踏在提籃橋風貌區，會發現其現況斑駁寧靜，也沒有上海新天地般的商品化襲產氣氛，由其現況我們可討論上海市官方歷史風貌保存規劃與實際空間—社會發展的遺脫。

在上海市的歷史文化風貌區範圍和規模宏大，時常涵蓋數個街廓，提籃橋風貌區作為上海市最小風貌區，亦涵蓋七個大街廓。風貌區的確顯示了某些管制力量，例如在 2018 年起的現地踏查中就發現，以提籃橋地鐵站為核心的幾個街廓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動遷開發，而風貌區以內僅有小規模動遷（例如猶太難民紀念館西側的擴建案）。廣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襲範圍也意味著管制內容過於籠統或無法精確落實，作為一處於 2003 年始劃定的風貌區，歷史建築群勢必與現代化的生活區域重疊。同時保存區內並不是一種被淨化後的文化資產，許多在保存規劃中被劃定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物，多數其實是被當作公房使用居住，而保存區內也有幾處現代化大樓雜錯的狀況。

就研究團隊訪談參與當時保存區劃設的專家得知，保存區範圍是由官方事先給定的，再委託專業團隊進駐調查，其邊界大致是「提籃橋街道辦」的行政里界。因此保存團隊的規劃工作中，必須先將區內的建築物依照歷史價值與保存現況做分類，對於現有高樓大廈並沒有排除或拆除的計畫。簡言之，提籃橋風貌區的劃定依據是政治決定優先，而由建物本身的類型建築價值來論證支持，一開始就忽略了提籃橋地區區域歷史、人口組成、空間使用的複雜性，歷史保存與居民生活沒有建立有意義的協調關係，自然也不該令人意外。

在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僅有少數建築屬於妥善維修保存並開放參觀的狀態。摩西會堂從原先猶太社群的會堂，轉由虹口區政府所管理的猶太難民紀念館⁹；下海廟有例行維修且仍有祭祀活動，算是地方信仰中心；而提籃橋監獄是持續使用中的監獄（2013 年被列為第七批中國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餘在風貌區中的建築多有居民使用，屬於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所管理的「公房」，包括美猶聯合救濟會舊址、遠東反戰大會堂舊址等保護建築，單棟建築中的多個房間內容納有多戶小家庭居住（一棟建築可能容納多達數十人）。由於產權與居住成員十分複雜，居民多稱之為「大雜院」。

上海自 1980 年代末以來成為中國都市研究之代表性案例。上海的發展具現中國經濟市場化過程在各城市如何透過土地開發權利轉移、政府角色轉變、成長聯盟發展而實踐（He 2010; He and Wu 2005; Wu 2003; Zhang 2002）。以上海盧灣區太平橋項目為例，楊友仁及張智惠（2003, Yang and Chang 2007）指出「租隙競逐政權」是一特殊治理機制，促使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能共謀利益（Yang and Chang 2007，尤其區政府扮演類似地主角色，同時兼具規劃權力主管機關，甚至於 2001 年以後掌握了授權外資發展土地的權力，而不需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同意。在「上海新天地」，歷史建築保存成為租隙競逐政權治理標的，由盧灣區政府與瑞安集團合作善用了象徵資本推動房地產發展，將原不受重視的石庫門建築群論述改造為東西文化合併的結晶，驅動地區高級化，延續先前學者指出 2010 年上海市世博前夕，區政府如何扮演開發土地供應者的積極角色（He and Wu 2009）。

本研究所的虹口區政府作為都市再生的重要推手，與黃浦、盧灣區屬於同城市

競爭開發之後進，近年鋪展計畫急起直追。然而，虹口區政府並沒有可觀的政治經濟實力來完成這個項目。更具體來說，動遷規模需要大筆資本，而這問題在風貌區劃定的當時過於樂觀輕忽，時至今日已近十五年，依然沒有得到可行解決方案，反而因為上海房地產水漲船高，而更形困難。

雖然風貌區整體保存工作遲滯，還是有少部分的進展圍繞著摩西會堂展開了。2006年上海社科院猶太研究中心舉辦「百名猶太名流重回故里」，許多猶太難民後裔追憶當年在虹口的生活點滴，提籃橋猶太文史襲產儼然成了虹口區外交媒介。2007年起，摩西會堂開始修繕擴建（2004年列為虹口區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公告為第四批上海優秀歷史建築），並成立「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2007年以色列外交部透過駐上海總領事館在霍山公園內捐贈興建一棟老人活動中心，以之取代以色列建國五十九週年國慶招待會，肯認致謝虹口區政府重視猶太難民文史，總領事館號召了二十六家以色列企業共襄盛舉。這過程再次呈現了提籃橋風貌區的襲產涉外特質（李佳佳 2007）（圖六）。此後，摩西會堂於2014年納入公告為第八批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現今摩西會堂是外國觀光客與外交部門極重視的景點，然而重視及相關推廣也就止於摩西會堂，外國公司始終無法充分介入整個保存區的開發與再利用，因為前述有關外國投資者與區政府協議所需的開發成本高昂的命題，始終未能解決。



圖六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本研究製圖；底圖來源同圖四；照片：本研究攝於 2019/2/14）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上海襲產保護體制歷經三個重要階段，是為理解本案例的重要保存規劃脈絡。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而來的快速拆除和大量重建期（1991-000）：這階段的拆除速度唯有在亞洲金融風暴時短暫地緩速，上海市景觀大改，第一個歷史文化保存區的指定要直到第二階段（2004）才發生。第二階段是上海世博前夕持續拆除和逐漸浮現的襲產保護（2001-2009），第三階段發展速度稍緩下來，以都市再生進行都市保存成為更強勢的主張（2010 至今）。

許多重要的保存規劃法制是第二個階段才完成。唯有自 2001 年起上海市政府才通過實行相關的動遷法例和標準化的補償措施，引入了「拆除、整建、保護」。2004 年一月起，上海歷史及文化保存區和優秀歷史建築的保護委員會才建置，因而才有基礎去實行支持整體維護和管理的中繼措施。此外，2003 至 2004 年之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了十一個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面積包括了 173 個石庫門建築形成的聚落街廓。接著整個區域都被納入第十二個歷史及文化保存區、幾乎位於市中心。整體來說十二個保存區加起來共有 26.96 平方公里。這時期完成了幾個知名案例，例如新天地，作為一個以房地產帶動再發展的開發模式（He and Wu 2005; Wai 2006）。

進入第三階段後，保存機制及相關法令已發展地更為完整。同時，因為上海市區房價飆升，土地稀少，地方政府若想吸引邀請開發商來推動大規模的改造，是困難的，由於涉及補償費用太高。新天地案例難以再複製。理論上，文化襲產局（創制於 2010 年）應會依序推動保存計畫，然因這些保存區涉及的相關持分者實在太複雜，以及不同草根力量的介入都市再生都需要更謹慎地注意公眾參與、持分者合作以及襲產分類實踐的工作細心協調（Zhong and Chen 2017）。同時，每個區政府的能力和發展議程不盡相同，有些區政府只是盡力要推動國家發動的仕紳化（state 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He 2007），未必會合作。而虹口區政府在上海市各區中，算是較不靈活而往往錯失市場良機的（訪談李桃，2017；訪談楊華年，2018）。在這保存態度和制度的轉變過程中，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進度因各種主觀及客觀的「配合」，保存進度可說是毫無進展，成為難以歸類於前述研究（Zhong and Chen 2017）的異例。

二十一世紀初提出的《浦江兩岸地區綜合發展規劃》有著更強企圖要打造行銷「北外灘」，甚至造成日後改名原社區行政單位「提籃橋街道」為「北外灘街道」，固然氣象一新，但引起不少老居民遺憾感嘆。¹⁰ 提籃橋監獄這一帶的戰前建築早年未獲重視，本因發展較上海其他地區緩慢也就保存下來。二十年前發展腳步開啓後原將有快速舊區改造，然 2002 至 2004 年間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之劃設，包括該區中重點文物單位

提籃橋監獄。虹口區共有三塊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¹¹ 阮儀三團隊曾提出歷史保存區內的發展權移轉，以作為保存誘因，同時倡議其富有價值，能促進北外灘願景下的文化旅遊潛力。雖然發展權移轉多年來未能落實，不過保存區的指定確實有其擋拆保護之功，未能落實的原因將於後補述分析。

（四）打造「北外灘」之下的提籃橋襲產化及文旅化

北外灘的打造當然不只是改名。上海國際客運碼頭於 2001 年二月列入上海市重大工程，於《浦江兩岸地區綜合發展規劃》下推動，2009 年正式啟用於北外灘，就此落實虹口區政府近年轉變水岸土地使用、以航運促進江邊發展航運一條街的願景，連結商辦大樓、音樂文化中心等大型設施。硬體基礎建設完備的同時，在正式改名之前，2017 年十月已成立北外灘功能區管委會，主要負責北外灘地區的規劃推動和宣傳，重點發展金融、航運產業，全力航向「5G 全球創新港」（鄭鈞天 2019）。

2008 年起研議的十二五（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實施期間為 2011-2015）以降，虹口區即致力推動發展航運、金融，在此背景下北外灘一帶更新再次錨定、全面舊改等等。接續的十三五文化規劃（2016-2020）主張虹口區作為海派文化發源所在地，以之主導強調「特色化」虹口記憶工程，推動公共文化建設，經營所謂「海派文化體驗消費特色」。其中，「猶太難民文化、精武體育文化、石庫門生活文化、歷史名人文化」等都是區政府視為記憶工程重點，以凸顯虹口區海納百川的多元開放。¹² 循此邏輯，十二五期間（2011-2015）虹口區已開始推動復建白馬咖啡館，調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展示。

襲產專家其實不見得同意白馬咖啡館的異地重建。2009 年，在虹口區全面舊改迎向世博的背景下，長陽路拓寬而拆遷了咖啡館，雖然依照拆除前的繪圖紀錄原樣修復，不過阮儀三認為從保護來講，異地重建是失敗的。

應該在原址，那馬路小一點沒關係，但是我們這領導...馬路還是要筆直筆直、長陽路還是要筆直筆直，它冒出來一塊就不好。我說冒一塊就冒一塊，有什麼關係。他們說難看，我說誰講難看？我講好看，有變化也很好。這是因為它是歷史建築，所以保它留下來。他不同意我的觀點，行政權在他手裡，不過我們跟他吵了一下，把他官也吵掉了。（訪談阮儀三，2018/10/19）

由此可見襲產保存過程時時充滿協商或衝突，沒有標準作法，唯有時刻挑戰著真實性襲產論述的空間政治會形塑不同結果。

（五）風貌區保存不易、實質推動範圍逐漸縮小

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包含的建築群眾多，其中以提籃橋監獄為最高級別資產，1994 年公告為第二批上海優秀歷史建築，1997 年公告為第七批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2013 年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然而監獄保存再利用持續因為監獄撤出遷移不明而延後，反而成為保護狀況最為不明且公眾無法進入的歷史建築。雖然隔壁黃浦區的地鐵站中仍留有提籃橋監獄博物館的展示廣告，然本研究團隊不只一次嘗試聯繫或直接叩門拜訪，監獄門房直白的回應：「展示館？沒有那回事」，對照 2013 年間可見的監獄搬遷及後續襲產保護報導，格外諷刺。附近居民則流傳戲謔的說法，歸因是現任監獄所長和副所長都已置產於虹口，「他們才不想通勤到郊區去」（訪談居民 B，2019/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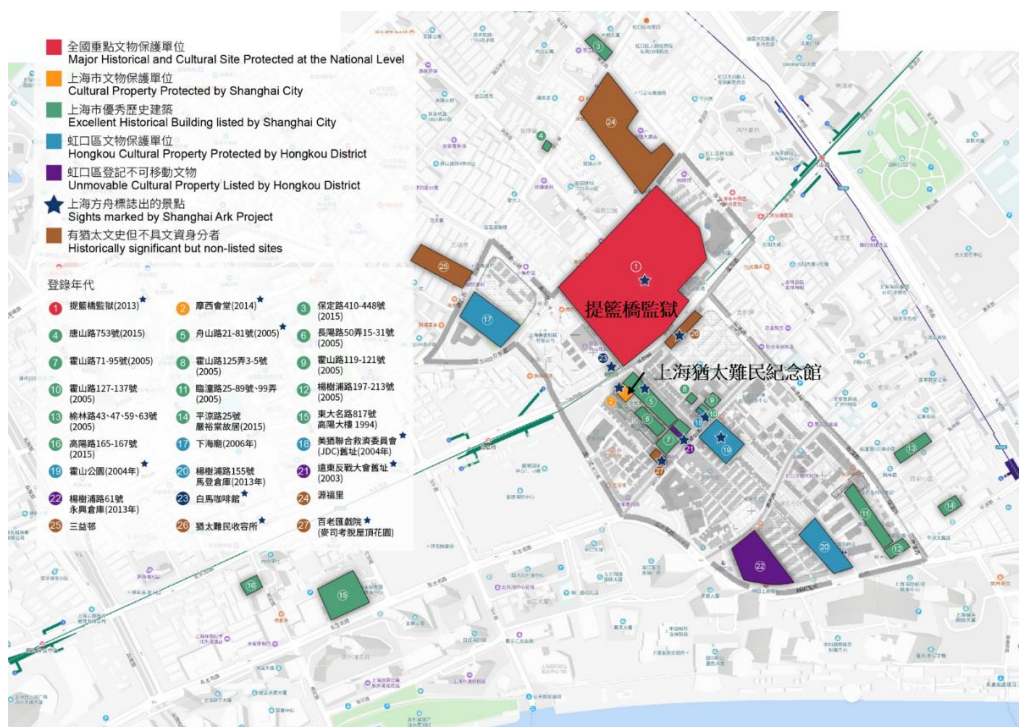
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為何難以保存？早年阮儀三團隊分析已指出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由大量的 B 級和 C 級歷史建築構成，A 級和 B 級則僅有 25%，單棟建築物之建築藝術價值不高，但整體構成的街區風貌卻是重要的。這注定了整個保存區的保存更為困難，大量的 C 級歷史建築物中仍有著大量的租客，如果要進行動遷安置，費用可觀，2003 至 2004 年已估計需每平方米需要至少二萬元人民幣（張艷華 2006）。

虹口區政府、地方政府它沒有太多的經費，希望都是外資投資開發，外資的公司又不想自己出錢，它只想我來招商，招商 OOO 來招，就招不起來。還有...這塊地你要用，政府要給它一點點優惠的政策。虹口區政府在它整個的發展裡，戰略上不在這塊地方。（訪談阮儀三，2018/10/19）

步高里就地留住之改造經驗在此也行不通，因該案所強調的居民生活日常構成主要里弄文化質素，並不適用於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強調的戰前猶太難民生活記憶。於是，此區除了進行摩西會堂和白馬咖啡館的拆除重建，以及部分的歷史建築物立面維護之外，沒有太多整修維護。在 2015 年三月，有一小區里弄住宅增列為第五批上海市歷史建築（HK-J-013-V，410-448（保定路 410-448 號），保定路），然而相關保存行動仍然付之闕如。

雖本計畫無法完整取得上海市政府委託阮儀三團隊所作的規劃報告《上海市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不過透過阮、張合著的《空間·故事·上海猶太人》與《提籃橋—猶太人的諾亞方舟》可概略掌握其要點。¹³ 據其記述，除下海廟與提籃橋監獄外，較重要的猶太文化資產點有摩西會堂、嘉道理學校、舟山路住宅建築、匯山公

園、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華德路收容所、百老匯戲院（麥司考托屋頂花園）、維也納鞋店、以色列信使報營業部、中歐猶太協會、東海大戲院、小維也納咖啡、源福里（唐山路 818 弄，位於保護區外）等等。上述重要建築構成了歷史文化風貌區內的建築共分為 A、B、C 三類（等級），A 類如列入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提籃橋監獄，僅占 10%；B 類如舟山路住宅（占 15%）；C 類則主要為舊式里弄，占 30%；D 類（現代化高層建築）以及 E 類（違章棚屋）近 40%，則不建議保存。劃定時已認定此區房屋老舊、通風採光與廚衛設施不足、高齡化與人口密度高、產權複雜、歷史建築質量差且多有搭建現象等等問題。換言之，該區雖有歷史文化風貌區的法定位階，但受訪襲產專家都同意房屋保存與文化質量不如上海其他風貌區，其猶太文史的歷史意義，遠大於建築保存價值。



圖七 提籃橋保護規劃中的重要建築
(圖片來源：本團隊製圖，底圖取自百度地圖)

若交叉對照猶太難民相關歷史、阮儀三的保護規劃、上海市政府發布的保護規劃，會發現其間有不少無法疊合處。首先，下海廟、提籃橋監獄與猶太難民文史雖然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文化發展脈絡不同，卻被劃在同個風貌區中。第二，並非所有位於風貌區中的建築都具有文化保存價值，例如早已改建的高樓大廈。而有明顯猶太難民文史的源福里（唐山路 818 弄）和三益邨，則並沒有被劃入保存區中；第三，具有文資身分的建築物，最大宗為西式住宅建築，例如舟山路、霍山路、臨潼路等處的連棟住宅，大部分與猶太文史有關，少部分則無（例如區內的馬登倉庫是外商倉庫建築，區外的保定路 410-448 號住宅則無明顯猶太聚居的歷史證據）。同時，傳統建築如里弄或石庫門建築，則無列冊保存。

（六）想像中的猶太人外匯引入、襲產作為對外宣傳工具

如前所述，2007 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成立，猶太難民歷史紀念館開始正式成為虹口區的對外展說材料。館方組織其實位階在虹口區政府之下，主要處理外交行政事務，本身沒有研究部門。據識者指出，紀念館的建置非屬歷史關懷，而是區政府下的宣傳辦—自改革開放起負責接待外國訪客的單位，透過八九零年代的來訪客人察覺到猶太難民歷史的潛力。

就是因為宣傳辦的話，也是負責中國的國際形象，需要跟這些外國人打交道。時間久了之後才發現，這些外國人都是有猶太背景的。[...]他當時主要負責接待這一大群外國人，他後來就慢慢感覺到，這可能是一個機會，或者是他的事業，或者是他的仕途，anyway，所以他就在 07 年的時候，猶太紀念館是他一手促成的[...]。（訪談 Brill，2019/11/16）

上述紀念館陳設背景，有點類似於新加坡樟宜博物館之成立緣起（黃舒楣 2014）。目前的陳儉館長，也就是當時的宣傳辦負責人。陳儉館長在 2007 年一手促成猶太紀念館建立，擔任館長直到現在。有些來自館內基層員工的玩笑話說，「當年陳儉館長是準備把這當作升官的一條跳板，沒想到跳來之後就沒法跳下一步了」（訪談 Brill，2019/11/16）。然而，該研究者認為虹口區政府偏向重視紀念館的文化外交功能而更甚於研究。

相較於提籃橋監獄之保存，似乎因猶太難民記憶之保存更容易連結全球猶太社群以及背後的以色列、美國兩國的支持，以收襲產外交（heritage diplomacy）之效，雖然相關歷史記憶帶有負面色彩，然中國能在此中強調當年上海居民慷慨包容相助猶太社群，反成正面效益，更容易獲得不同層次的大力支持。相對來說，提籃橋監獄所相關側重戰爭經驗，不是那麼正面積極。

來訪的觀光客主要為幾類：以色列、美國、德國為主的團客，主要是因為納粹相關歷史紀念。東亞國家包含日、韓、臺、新加坡，主要是散客，以商務客的文史觀光為主，今天就有為一位臺灣女性做導覽。外交合作方面，主要以美、以、波蘭外國領事為主。中國本身的觀光客，主要是政府機關人員（統稱「領導」）和學齡兒童（國中、小、高中都有）的紅色教育，但主要侷限在虹口地區，非全國性景點。（訪談 Nelson，2018/10/25）

不過，歷史學者楊華年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些國際來訪的猶太難民後代的熱情會逐漸消退。

這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已經猶太人[來過了]，現在已經不太會找了。這就跟日本人找上海一樣，日本人找上海的時候，80年代90年代是最多的。因為都是當事人，跟當事人的第二代[...]。你不要期待第四代、第五代再來找。當然也會有，只是已經是很少很少。我在90年代，十多年以前接待的日本人，找他們的祖上的，很多很多。現在來找祖上的，很少很少。第三代第四代的很少。所以不要期待以後猶太人一直回來。（訪談楊華年，2018/09/05）

儘管如此，由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當地人所投射的期待，反映出一股持續醞釀的對外主張，具體呈現在猶太難民紀念館的落成及開放，學者當然不無批評，指出了猶太難民歷史之當代建構宛如神話，有其誤導性（Pan 2015; Wang 2017），甚至商業化了歷史記憶。至於提籃橋一帶的居民，居住時間稍長者，很喜歡提及猶太人之有錢，以及猶太族裔之小氣，「他們不太願意出錢（修復）呀，我們以為猶太人不反華」，此話語多嘲諷及刻板印象，凸顯了在中國「猶太人」相關認識的不穩定和不確定，不如官方論述美好。

（七）外交因素之複雜：一帶一路、中東問題、中伊關係和中以關係之間的矛盾

提籃橋的猶太文史有其高度政治敏感性，牽涉中國與美國、以色列、阿拉伯國家的國際情勢，官方始終非常慎重。阮舉例，近來中國官方為求一帶一路政策與阿拉伯國家交好，就會刻意淡化對提籃橋猶太文史的關注度，以維繫國際關係平衡。

那麼虹口區我多年作下來，小家子氣，沒有看東西的眼光。[...]中國對於這個地方，對猶太人地區的保護和開發，形成疑慮。為什麼？因為中東很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不太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鬧得很厲害，世界上不是鬧得很厲害？一邊是美國一方，一邊是阿拉伯一方，鬧得很厲害。那麼你這一塊，就是傾向在以色列那方，你說是猶太人倒過來全是以色列，出面都是以色列。猶太人猶太人...，譬如說這塊地方猶太人保護區裡面，所有的美國的總統都來過，報章沒登過。（訪談阮儀三，2018/10/19）

近年，虹口區對提籃橋猶太街區申遺進行可行性論證，爭取申請世界記憶遺產，一方面以館為核心，串聯歷史地點打造「方舟之路」方案，從支持推動相關研究（例如《來華猶太難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論與模式》2010-2017，由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支持），一方面提出規劃該區將以猶太難民紀念重現上海接納猶太難民的歷史記憶。

（八）城市現實政治

現在的城市規劃，三分之一是有專家、設計的團隊作規劃，但三分之二的決定權是領導，領導的夢想。（訪談楊華年，2018/09/05）

我們想，這些房子劃出來都希望保護的。他們現在的想法就說，不需要保留這麼多，都撤掉。他現在不來問我，我也不知道。（訪談阮儀三，2018/10/19）

根據本團隊訪談參與保存規劃的主要建築師表示，歷史文化風貌的範圍乃是由政府劃定後，再委託其團隊進行建物調查。區內產權非常複雜，居民對保存的意識也不高，維修也非以保存原貌方式整建。當時的規劃主軸是要結合北外灘與濱江的郵輪碼頭，轉作猶太文化觀光旅遊資產，也曾規劃在風貌區外建立高層住宅，提供區內居民動遷安置，但未被政府採納，因為該區周邊土地幾乎都已招標。

說白了，你要把這裡的居民先清出來，不清出來沒法動，這麼大片區域。但是清出來就要給補償，補在哪、多少錢給他，對吧？這是很大一筆投資、拆遷費吧。當時我們初步算一下，好像要四十個億吧？[...]更別說後來上海整個房價地價又登登登地往上漲，你要再用錢全部把他們...更不可能了。（訪談陳麗人，2018/10/20）

當時保存專家曾提出區內在地安置方案，建議虹口區政府規劃三幢高層建築緊鄰保存區外，提供區內動遷安置而非以現金補償。

因為很多人不願意到很遠的地方。但你說就近給他房子住，他是 OK 的。但是虹口區政府就說：沒地啦，不行，說這塊地不能拿出來。所以後來這塊地他們又賣給別人了（笑），其實當時周邊都還有地的，他們說不行，這些地已經都賣掉了，所以不能拿來做相應的配套的改造，所以以後就更難做了。（訪談陳麗人，2018/10/20）

在研究團隊實地踏查期間，北外灘地區的開發案正逐步進行，如白玉蘭廣場（已建成）、星港國際中心雙子塔（興建中）等。在歷史文化風貌區外圍，特別是提籃橋與大連兩個地鐵站周邊的街廓多已動遷清退。

整體而言，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有民間倡議者如 Bar-Gal、專家學者阮儀三等關注，同時地方政府透過襲產外交的操作，拉升國際關注度，但地方政府其實無能介入國家外交情勢。雖有歷史風貌區與文物保護單位等的點狀文化資產，整體保存狀況也受限於房地產開發市場的邏輯中。在 2000 年起民間由專家學者帶頭倡議促成了 2003 年官方劃定歷史文化風貌區乃至於 2015 年上海方舟計畫與 2018 年摩西會堂博物館館舍擴建等一連串虹口隔都襲產保存的歷程中，雖然區級政府持續想透過襲產外交來凸顯虹口隔都的重要性，但整體保存規模趨向縮減面積與點狀化。

（九）申遺轉向：朝向 UNESCO 世界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申請

2015 年因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虹口區政府公告以「猶太難民在上海」為主題，蒐集難民名單、口述史、影音視頻等資料，預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加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許曉青、孫青 2015）。核心景點周遭也有「上海方舟」圖樣的地磚，幾處解說牌共標誌出提籃橋監獄、白馬咖啡館、猶太難民收容所舊址、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薩爾舊居、遠東反戰大會舊址、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霍山公園、羅伊屋頂花園舊址共計九處景點。這些解釋重新盤點，呼應著文獻中討論的猶太記憶為普世主義工具化過程，猶太元素被動員以召喚「歐化普世主義氣息」¹⁴，輝映近年在提籃橋猶太難民展示館的展覽，偏好呈現歐陸生活方式（如飲食、衣著、用品）、優雅文化慣習等等。然而，戰事爆發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許多猶太人並非以歐陸為主（包括約一千位來自巴格達的猶太人、近七千位來自俄羅斯），雖然遠少於來自德奧及中歐的猶太人，但人數未必等同於影響力，其實早期巴格達猶太人的政治經濟影響上海深遠，至今仍銘刻於沙遜家族留在外灘的經典建築，以及持續受到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刻意忽略的靜安區拉結會堂。

總之，2015 年以降，轉向世界記憶（檔案遺產或稱文件遺產）之申請趨勢更為明顯，同時，保存風貌區歷史建築申請世界遺產的倡議聲音仍持續，直到 2019 年初仍有市委於正式會議中提出。直到同年五月上海市文物局給出的正式回應中清楚可見，根據中國國家文物局頒布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規程（試行）》，虹口區人民政府曾就提籃橋猶太人聚居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事宜開展過前期研究，組織專家論證，最終認定提籃橋猶太人聚居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性不大，癥結在於其完整性、獨特性等方面較為不足。虹口區政府轉而建議，應借鑒「南京大屠殺相關史料」經驗轉而申報世界文獻遺產，世界文獻遺產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延伸，成功率可能會更高（上海市文物局 2019）。

上述官方回應確認了目前申遺重點在於「上海猶太難民生活檔案」（由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與虹口區檔案館聯合申報，入選第二批上海市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目前，在市檔案局支持下，正在積極準備申報第五批「世界記憶中國國家名錄」，為未來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奠定紮實基礎。虹口區亦表示猶太難民檔案的挖掘和利用工作將作為其「虹口記憶」工程的重要項目（上海市文物局 2019）。

本來此例應有機會突破既有世界記憶相關研究限於歐洲觀點，以虹口區推動競爭襲產化的各方互動過程中，如何以「世界記憶」為一看似門檻較低的申請類別，來突破都市街區保存的政治經濟困境。同時，這案例也有機會突破近來世界記憶申請在東亞因爭議案件而引發地緣政治衝突的狀況，成為中國申請案中少有帶正面形象的普世化記憶，以挑戰既有論述中往往預設普世化記憶追求僅發生於歐洲，經驗研究多以西歐為一核心來理解戰爭記憶之轉化作為打造歐洲認同基礎。然而，在其研議申請的工作文件中，可發現此申請仍帶有地緣政治、記憶政治交鋒的氣味。

誠如 Wang（2017）指出，近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積極在海外辦理展覽，除了推廣該館為國際社會認識，同時更期待能因此而接觸猶太難民後裔，有機會邀請說服他們協助蒐集檔案史料甚至是能「見證當時上海難民生活」的相關物件。此過程初步看來帶有正史詮釋目的性，大過於紀念性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值得注意，中國近來理解「世界記憶」為外交及宣傳工具，同時是「澄清歷史事實的重要途徑」。「入選世界記憶襲產能極大地提高相關歷史被保護的力度和世界知名度，便於更好地對外布展和宣傳，開展有利於中國的民間外交，塑造中國良好形象」，而救助猶太難民史實是中國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歷史事例。2019 年三月，上海政協提出了計畫要加快推動

申報上海猶太難民檔案作為世界記憶，以推動民間外交、強化論述「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追求和睦、善良、包容的民族」。尤其，該提案主動提及日本政府遞交外交官杉原千畝為猶太人辦理過境簽證來上海的歷史（通過在立陶宛建紀念館、拍電影等進行重點宣傳，並列入日本教科書。2017 年底，日本曾遞交相關文獻檔案申請世界記憶遺產，目前該申請暫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拒絕）¹⁵，可能造成國際社會對歷史「不全面、不正確瞭解。應該加快推進猶太難民檔案文獻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將這段歷史事實在國際社會固定下來，不給其他方面混淆是非的空間」。¹⁶

上述中方襲產化動作，或可對照日本推動在立陶宛成立杉原千畝紀念館（2018 年初日本首相安倍訪問立陶宛時即特意拜訪由日本大使館改建的杉原千畝紀念館）來看其隱然進行的競爭。隔年（亦即 2019 年十月），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國際諮詢委員會在上海虹口成立，再次宣告中國在二戰期間無私支持猶太人的人類貢獻，會議新聞稿強調，在上海經驗中，中國人「救助被法西斯迫害的猶太人，充分體現了人類歷史上相濡以沫、友好互助的精神。在國際上講好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故事，能引起包括猶太世界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鳴，有助於國際社會更加認同和支持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¹⁷



圖八 「上海方舟」計畫解說牌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9/2/14 攝於舟山路）

除了積極整合物質襲產和非物質襲產、歷史記憶，近年以上海猶太難民為題的藝術創作和展演多了不少，以流行文化來推動猶太難民記憶國際宣傳。例如製作音樂劇（微光 Shimmer 2017，國際展演適逢中美建交四十週年至紐約演出、中以建交二十五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週年至台拉維夫巡演)。同年另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支持的原創音樂劇《猶太人在上海》在以色列台拉維夫海卡爾劇院首演，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以色列建交二十五週年(朱淵、江妍 2017)。

猶太難民紀念館同時積極對外輸出展覽，在美國、歐洲都持續推出，例如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華裔美國人博物館(The Chinese American Museum in Washington, DC, CAMDC)推出「安全港灣：上海，二戰猶太難民的意外故事」(Safe Harbor: Shanghai, Surprising Stories of Jewish Refugees in World War II)特展，展期半年(羅曉媛 2019)，同年早先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公共圖書館也有相關主題展覽(展覽名稱：“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同步在四個分館展出，大約於 2019 年三月至六月間進行)。2018 年一月在義大利杜林(Turin)則有“Jews in Shanghai - Last Hope and Ultimate Help”為名的展覽，由杜林大學孔子學院、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共同籌辦。

為了強化申請世界記憶的學術嚴謹和論述正當性，2015 至 2019 年之間年年有相關主題研討會，而由此我們亦能看見回應著襲產化轉向的專業領域轉向。重要舉例如下：2015 年六月一日至三日由美國圖倫法律中心聯合上海外貿大學、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所、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等共同舉辦「法律與社會：上海的猶太人」國際研討會；2017 年八月十三日，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新書首發暨「來華猶太難民資料庫」研討會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2018 年五月十一日「俄國猶太人和『白俄』在中國(1900-1950)」學術研討會於上海猶太研究中心舉行；2019 年十月二十三日國際諮詢委員會成立(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國際諮詢委員會成立儀式暨上海猶太難民研究與歷史記憶共享國際研討會舉行)。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當然是其中關鍵，此外還值得注意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建立於 1988 年)，以及中心主任潘光作為關鍵學者。潘光是政治學出身的歷史學者，是中國猶太研究的佼佼者。襲產化目標由物質襲產轉向檔案襲產的過程中，相關專業的話語權威也從建築襲產保存專業轉向了歷史學、猶太研究。這也某程度影響了本研究的方法及資料取得，身在其中正謹慎投入檔案襲產申請的上海猶太研究中心趨向保守，不會輕易揭露分享申遺內情。而淡出襲產化過程、甚至已退休或轉換跑道的建築襲產專家則多些意願回顧當年，且坦言他們對於目前發展所知甚少。這狀態本身其實顯露了襲產政治涉及的專業互動和領域競爭。

還值得一提的是，相關的影像製作隨著記憶遺產申請越來越正式化而方興未艾，且不限於來自上海。早先最有名的一部紀錄片是由猶太人難民後裔 Dana

Janklowicz-Mann 以及 Amir Mann 導演的 *Shanghai Ghetto* (2002)。2017 年則有 *Above the Drowning Sea* (中譯「上海餘生」) 由美籍導演 René Balcer (其妻為上海人) 主導，彰顯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領事何鳳山當年慨然核發簽證的義舉貢獻。美國公共電視 PBS 於 2012 年推出短片介紹，訪問一對猶太兄妹，他們共同撰書出版分享他們家人的避難上海經驗。PBS 近期正在支持製作一部新紀錄片，聘用中國導演，希望透過這題材呈現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要。研究團隊因緣際會地認識了這支影片的美籍歷史學者顧問，得以有機會瞭解其敘事取徑，以及材料蒐集過程中，學者、導演、相關館方彼此未必能達成共識的動態狀況。參與其中的學者私下表示，導演和館方希望導向的全然正向交流和中猶文化交匯，不免生硬甚且偏離史實。本文限於研究時間和篇幅，未能完全關注深入分析相關影像製作所產出如何「再現」猶太難民記憶，有待進階研究處理。然此處值得指出的，是近年轉向記憶襲產的競爭場域，已超越了物質性建築環境、物件（順帶也就達到了技巧性克服物質襲產保存困難昂貴的課題），而進入了檔案文件蒐集、敘事、影像再現的領域。以上舉例多為由在美難民後裔或中國官方發動的記憶敘事實踐，不過近年也有日本導演 Kenji Kanno 在墨爾本訪問了曾流離上海而最後安居於澳洲的猶太難民，剛剛完成德日共同製作的紀錄片 *Where but Into the Sea*，這部片凸顯不同的逃難路徑，是關乎猶太難民如何藉由日本大使杉原千畝經手的簽證，由立陶宛到了神戶、後經日本政府安排到了上海，戰後才到澳洲。不同的影像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了不同國家意欲透過記憶襲產來重述歷史的行動。¹⁸

四、居住在歷史文化風貌區中的窘境

那邊好多人都意識不到為什麼要保護這些東西，我們進去調研的時候當時（註 2003-2005）都不敢說我們去幹嘛，因為...，他們見到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喔這個房子是不是要拆啦？拆了之後要給我們動遷，所以要給我們補償，我們可以住新房子了。要把這房子給拆掉，就是了。（訪談陳麗人，2018/10/20）



圖九 風貌區內舊猶太人住所，今日多為多人共居的「大雜院」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8/10/20 拍攝於舟山路)

(一) 作為公房維護與使用的歷史建築現況

由地鐵提籃橋站出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拓寬後的筆直長陽路，不出幾步路走入提籃橋風貌區的街巷，由舟山路轉彎，低樓層里弄建築群和小商行林立，相對老舊而安逸的氣氛和車水馬龍的長陽路截然不同。

平心而論，風貌區內的建築雖然老舊，大致還能顯現街道辦等政府有關單位定期進行修整粉刷，維持一定的市容管理，不過現況顯然不是講究原真性與歷史考證的文化資產修復模式。為了呼應提籃橋地區猶太建築中英式紅磚的建築風格，有些建築牆面會以水泥浮雕或粉線來模擬磚牆，而某些非歷史物件（例如弄堂口牌坊）也會為符合整體風格而披上仿磚造外表。然而，對大多數居民而言，抱怨公房品質低落的心情，遠遠大過於住在歷史建築中的驕傲感。公房居民更在乎住房品質，在踏查過程中時常聽到居民抱怨政府單位只維修建築外觀作表面，對於內部雜亂管線、木門窗破損、廚衛設施缺乏等問題不予理會。因此居民會依各自需求來增設廚房爐具、自行隔間或

拆除增補建物局部。對於渴望動遷的居民而言，公房維修的程度也成了揣測政府動遷政策的一種信號，對公房居民而言，動遷是他們脫離貧乏居住條件的重要機會，當政府部門開始修復建築外牆時，居民覺得住房環境改善固然是好事，但也意味著小區近年恐怕都沒有動遷機會，不少人覺得無奈，時常十分低落。

因此，在提籃橋風貌區中，歷史建築本真性是弔詭的存在。官方以公房管理方式看待文化資產，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歷史混淆；同時，上海市中心公房數量之大，歷年來管理難度高且更新不易，只有低度管理（詹水芳、齊峰 2013），是否有大規模的整修端賴居民的經濟狀態而定。近年來上海市強化申述其改造舊區的決心，針對二級舊里（正是提籃橋地區多見連棟式石庫門磚木結構住宅，構造較好）提出改造目標。2017 年上海市為此重申《關於堅持留改拆並舉深化城市有機更新進一步改善市民群眾居住條件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強調要「推進優秀歷史建築、文物建築、歷史文化風貌區內以及規劃明確需保留保護的各類里弄房屋修繕改造。「十三五」間實施修繕改造二百五十萬平方米，其中優秀歷史建築修繕五十萬平方米。¹⁹ 近年，確實可見風貌區以外的虹口確實正積極推動舊區改造，2020 年三月上旬，虹口區甚至在推動 138 街坊舊改動遷，其範圍就緊鄰舟山路西側（蔣迪雯 2020）。



圖十 風貌區中的公房弄堂口正在進行例行維護，以水泥仿製磚牆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8/10/24 拍攝於楊樹浦路）

（二）顛沛與流動下的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居民圖像

作為上海都市腹地的虹口的人口流動特性很高，它在租界時期屬於英美公共租界，租界作為統治權力角力的前線，其邊界乃隨著當時中外國際情勢而變動，例如小刀會與太平天國起義引發的逃亡與庇護、租界當局越界築路的外國勢力拓展、五卅運動民族自決時中外衝突等等因素。在 1932 年一二八事件後，日軍逐步掌握虹口在內的租界地區，許多日僑開始聚居於今四川北路。1937 年隨著歐陸排猶浪潮，猶太難民來到上海，1942 年日本當局成立了猶太難民隔離區。再加上虹口區位處黃浦江濱，在近代被賦予工業發展的區位意涵，虹口區與楊浦區的河岸邊有許多碼頭與棉麻工廠，也吸引了外地來的工人移居至此。複雜的歷史動盪與區位特性，造就了虹口地區複雜的人口圖像。

然而，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工作偏重鮮明的猶太難民歷史意涵，相對忽略了歷來居民複雜而流動的生命史。摩西會堂作為上海猶太難民記憶重要的展示節點，是提籃橋地區中猶太意涵最鮮明的區域，在館內陳設中強調上海猶太難民時期的中猶友好關係，以及當時中猶作為鄰居間的密切接觸。紀念館不僅採用了猶太難民倖存者的口述訪談，也蒐羅了黃包車模型、中猶聯姻婚紗、猶太裔音樂老師教授中國學生音樂等等藏品，來強化跨越種族與階級的交流。初到田野過程中，我們嘗試尋訪居民記憶中的猶太難民歷史。但鮮少有居民可談得上幾句猶太難民的記憶，通常直接推薦我們去紀念館看展或接洽館方。顯然這不只是年代久遠記憶凋零的問題，同居民隨機訪談中可得知此區多數居民多是戰後才搬入，沒有親身經歷大量猶太難民遷入虹口。由於戰爭時期流亡逃難潮、戰後猶太難民返國房屋轉賣、中共建設後所實施的房屋公有化等因素，1949 年後提籃橋地區的房屋產權與人口組成，已與戰前大不相同。提籃橋地區為數最多的居民其實並未經歷猶太難民時期，成為了猶太難民記憶的旁觀者。

「公房」是提籃橋風貌區中具歷史價值建築最主要的使用型式，主要原因是該處原屬於外國人的房舍，在中共建政與文革等背景中被充公，並且成為制度化的公房體制，亦即類似臺灣所理解的社會住宅。²⁰ 民間泛稱的公房包括房管局直營公房，以及公有企業提供的職員宿舍（系統公房）（詹水芳、齊峰 2013）。公房數量龐大管理不易，官方採取低度管理，民間會自行進行公房租賃權轉移，讓公房數量龐大的提籃橋地區增加了更多人口複雜性。許多居民提及早期當家庭成員或職涯變化時，會在布告欄或電線桿上貼出「換房子」告示，與同樣具有公房租賃資格的市民交換房舍，因而輾轉搬遷到提籃橋地區。在開放私有化後，部分公房也可向政府買斷。在 1949 年施行社會主

義經濟後（民間所謂「解放後」），上海仍保持部分商業都會的性格，許多居民追憶東大名路曾是熱鬧的娛樂與商店街，有三處電影院等等，而提籃橋地區有當時熱鬧非凡的市場。中國經濟市場化之後，上海重新成為全球化都會，作為上海邊緣城區的虹口區維持了多年鄉里氣息後，終究因不少里弄房舍開始動遷而有街區人數銳減、提籃橋市井人潮不再的現象，南緣街區轉為與北外灘呼應的摩天商辦大樓，地區逐漸高級化。不少居民老人難免感嘆。

提籃橋地區保留了許多里弄式公房，多屬於所謂「二級舊里」，較俗稱「棚戶」的一級舊里略佳，二級舊里在棚戶已多清除後，是目前上海舊區改造的主要目標，以官方眼光來看，多屬構造普通而衛生基礎設施欠佳。近年來，較有條件的老虹口人早已搬離該區，公房則轉租給來到上海打拼生活的農民工。公房以外，提籃橋的惠民路、舟山路上有些平價旅館，可日租或長租，旅館門口停放非常多快遞機車，呼應了今日不少年輕農民工從室外送快遞的近期報導。這些旅館房多為衛浴共用、四至六人上下舖共居的安排。於是，提籃橋地區的人口持續有替換，不過日常生活總保有基層庶民活力，例如傍晚後的東餘杭路會變身成熱鬧的市場，各種攤販把貨品堆置在人行道上、行人與電動車擦肩而過、居民在街邊擺上餐桌或直接就水溝蓋洗滌。一些老房子也改成隔間式的便宜出租套房，簡單的上下舖提供來上海打零工者分租居住，外送工之外，近年因北外灘建築工程多，建築工人跟著多了起來。農民工通常覺得上海生活艱難，不過總體來說還是優於農村生活條件，他們在二十年間求生存亦見證上海房價物價飛漲（隨機訪談筆記，2018/10/25）。然而這些鑲嵌於提籃橋地景的在地生活記憶未為官方承認，而舊建築多被認為是不符合上海城市形象、有待動遷改造。

同時，里弄公房中還有些人口是原租戶老人，不全然是社經條件低落者，不少人享受國企退休金（每月約 5,000 至 8,000 人民幣不等），子女已於 2000 至 2010 年間工作、成家後購入郊區私房，這些老人因而較有能力自行翻修公房（如增設現代衛浴），並與鄰里保持緊密互動關係，享受著舊城區的購物、醫療機能 and 社會網絡，反而會認為在郊外的動遷房生活機能發展尚不全。這些六十至八十歲高齡者尚能自力生活，甚至是負擔孫子隔代教養責任的主力。在上海因缺乏平價幼托能為民間肯定信任，兒童三歲前多由祖父母養育。我們發現有案例是祖孫同住舊區公房老家，兒子在浦東等郊區工作，為了讓孫子取得市中心較好學區（隨機訪談筆記，2019/2/21）。也多有長者居民一家購置新房產，但他處新房留給結婚成家的兒女，長者自己則留住或回歸舊區。這些人留在舊區且多少珍惜舊區生活方式，倒也不是為了歷史記憶或文化情懷。



圖十一 單棟建築中家戶居住使用概況。以霍山路上一棟三層樓住宅為例，容納超過十組公房，包含單身乃至於四五人同住的家庭，以及少數已將「公房租賃資格」轉售他人的單元（本研究繪製）

（三）再製中國居民的猶太難民記憶

從一些家族史、遷移史與生命經驗的田野資料，大致可拼湊出提籃橋地區居民與其記憶的圖像。如今仍健在且真正經歷過猶太難民時期的居民為數不多，若曾與猶太難民互動過，多數因年紀太小而印象不深，不過家中可能存放點有關猶太人時期相關的物件。例如在舟山路 54 弄小區內的建物中，有些後門上保留了六芒星造型的鐵件窗框；唐山路 599 弄的三益郵弄堂（民間稱之為「外國弄堂」），巷弄內有個立有說明牌的消防栓，設於 1929 年。在弄堂中也訪談到一戶老夫妻，曾經歷隔離區時期猶太人、日本人、中國人混居，其家族於 1943 年避居重慶，1946 年後回到該弄堂定居後，許多猶太居民也開始紛紛返國（隨機訪談筆記，2019/2/21）。而在猶太難民紀念館的第三展覽室中也以居民捐贈的老傢俱，復刻出當年猶太居家空間一隅。

另一類居民表述則刻意與公房大雜院的居民做出區分，主要是二戰後到解放前遷

入的老居民，即國民政府在上海的時期，可能經歷國共戰爭動盪來到上海。多數都會提及當年父執輩用金條向準備離開中國的外國人買下房產。但隨著中共建政與文革等因素，房屋可能被充公，僅保留部分房間自用。家族若曾與國民政府往來則可能遭反右鬥爭，不過這類壓迫記憶仍有政治敏感性，描述時較為隱晦。

今日大多數提籃橋居民其實沒有經歷過猶太難民時期，凸顯了官方所宣稱的「中猶友好」其實是一由上而下啟動的論述建構。由於日本所設置的提籃橋猶太難民隔離區並沒有展開系統性屠殺，其倖存經驗被視為全球猶太難民記憶中僅有的正面案例。但從少數有猶太難民記憶的居民的口中得知，大多數與猶太人僅是鄰居或點頭之交，有些居民在兒時見過猶太難民，但隨著二戰期間戰事緊張而流離。另外也有歷史研究者認為，官方為了服膺難民記憶正面性的目的，在口述歷史的採集和揀選並不夠嚴謹，而這些歷史材料又會通過大量的文化與政治宣傳而被強化（訪談 Brill，2019/11/16）。雖然部分居民會提及對猶太人因文化差異而帶來的衝突（例如批評猶太人精於算計），但當官方試圖動員在地居民述說上海猶太難民記憶時，居民也不會刻意表述負面的內容。

因此，國際化與人道主義形象的上海猶太難民記憶的特殊化，伴隨著的是與居民生活以及普羅記憶的斷裂。對居民而言，與猶太記憶最切身相關的，大概只有時常來尋訪的猶太觀光客。多數居民對於尋根的猶太觀光客或其他有興趣的訪客抱持開放態度，能簡單介紹甚至同意遊客進入家中，許多居民也會提及猶太觀光客會要求與居民和老房子合影，以寄發給可能年事已高不便出國的親人，做為暫居於提籃橋而倖存的緬懷與感念。而該戶居民是否是當年原居民，或曾援助過猶太親人的中國老鄰居？或已不那麼重要（圖十二）。

（四）公房動遷與歷史保存的弔詭關係

對專家來說，在此進行動遷是歷史風貌得以保存的重要手段，居民理解的動遷則夾雜多重感受和期待，絕大部分倒非故里情懷，更多是他們認為搬至郊區的動遷房意味著要離開便利的市區。不過，多數居民不排斥甚至期待動遷，動遷並不只是流離失所或被迫背負房貸進入私有房地產市場，反而是得以離開破舊的公房，領取補償的翻身機會。在提籃橋地區許多弄堂內也會出現投資客預先購置的公房產權，以期待動遷後高額的補償金，例如區內部分房仲業者會販售「公房使用權」的房產，通常因為面積狹小或屬於附屬建築並不供真正居住，實是作為投資標的；而對於政府而言，動遷是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透過國家力量引導都市更新，並與開發商共同享有土地金融的利益，在中國經濟上行的背景中是最便利的發展模式。但現實是，由於上海近年飆漲的房價與提籃橋地區紛雜的產權關係，昂貴的補償費用常迫使動遷過程停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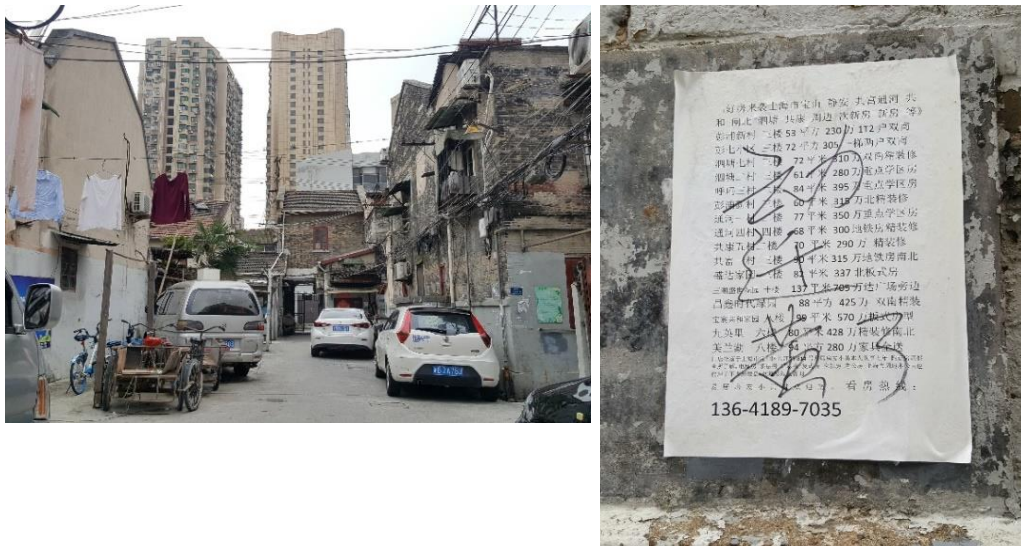


圖十二 猶太家族尋訪提籃橋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9/11/17 拍攝於舟山路)

近年隨著猶太難民紀念館擴建，以及提籃橋地鐵站出口處施作了綠化景觀設施，提籃橋風貌區的再開發似乎有了眉目。在 2019 年初始約半年內，紀念館西側的單邊里弄就已動遷完成，過程非常順利。據鄰居們的小道消息，乃是政府大力支持下，居民獲得了很優渥的補償金。動遷期間除了協助動遷事務的辦公室進駐之外，紀念館也貼出公告，指出家戶內若有猶太時期的舊器物，可在搬家清退過程中捐贈給紀念館。但擴建的同時，僅存於居民印象的中猶互動記憶更加速退場，不無諷刺，例如當我們想透過某位在地老居民，聯繫其曾目睹猶太難民的老朋友（隨機訪談筆記，2019/2/16），才得知其友人已隨館舍擴建而搬遷到郊區與子女同住，僅能以電話連絡。

風貌區內的清退並非完全順利。猶太難民記憶的民間倡議者指出，在風貌區外其實有許多猶太難民居住過的弄堂，例如三益邨或源福里（圖十三）。其中源福里在內的街廓在 2018 年底一度啟動動遷，里弄內也張貼了許多慶賀文宣與動遷訊息，官方也設立了動遷辦公室，以組合屋搭建十數處提供諮詢的辦公室。通過專業訓練的辦公人員會向民眾說明須具備何種文件，以便在動遷過程中獲得較好的補償，並在街區內展開

意願調查與測繪計算。令人意外地，動遷辦公室與居民的互動可說是親密且良好，例如有家庭因動遷衍生的產權糾紛而「鬧矛盾」，辦公人員也提供了許多向公部門申請文書證明的建議。巷弄內也有許多房仲業者穿梭，打聽動遷補償的訊息，並向居民兜售二手的商品房。在 2019 年年初，研究團隊再次造訪時，動遷工作停擺，居民在巷弄中留下「動遷黃了」的塗鴉，以表示對動遷工作停擺的不滿（圖十三）。例如某位租了攤位經營家庭裁縫的居民原已向顧客們告知店鋪搬遷，周邊店鋪許也多已遷移，如今動遷卻停擺，已安排搬離的人們突然進退失據。據聞動遷臨時停擺在周邊街區時常發生，倒不是新鮮狀況（隨機訪談筆記，2019/2/16）。



圖十三 風貌區內的源福里原定進行動遷，突然停擺引起不少怨言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9/2/16 拍攝於源福里）

提籃橋風貌區牽涉了保存邊界劃定、記憶特殊化、動遷與再開發等種種張力。提籃橋風貌區的劃設，乃是奠基於集權國家對於都市發展的管控權力、歷史保存學界的進步式倡議，以及上海猶太難民普世記憶的彰顯，但很顯然與提籃橋在地的社會脈絡有所扞格。不僅牽涉保存過程中文化論述的篩選課題，也牽涉了保存式開發的財務需求、公房如何轉型為襲產等等現實因素。提籃橋風貌區的歷史景觀管制條件之下，造就了兩難局面：寓居於襲產的居民，不太在乎猶太難民記憶，甚至期待趕緊「被動遷」以離開生活條件差的公房。同時，政府有關單位也透過清退公房居民，來遂行文化資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產保護的目的。這似乎挑戰了以文化保存之名進行的再開發，現地保存或近年中國時興的「原生態」²¹保存觀的政治正確性，意即似乎必須忽略或抹除庶民生活記憶，提籃橋猶太難民記憶才得以彰顯。但在動遷並不太順利的現況中，猶太難民時期擁擠雜錯的居住狀態被延續下來，虹口特殊的庶民生活也得以展現。

訪談中發現，有部分居民的居住歷史跨越戰爭前後，屬於那些戰前即持有這些房屋財產的家庭或家族，他們評價自身居住歷史和城市身分認同會相當不同於戰後才經政府安排而入住者。差異也凸顯於其家庭或家族是否曾經接觸那批猶太難民。有少數參與相關歷史計畫的研究者坦承部分的所謂「見證者」其實是訓練有素的說故事人，並不代表多數狀況（訪談 Brill, 2019/11/16）。居住在所謂襲產建築群落中，多年來仍某程度須以「新居民」自居，他們的不安感受，影響其無法充分感覺到安身立命、成家落戶，也進而影響到他們難以實踐「成家作為身分認同和記憶表現」（Macdonald 2013: 96）。

這時有時無的困窘不安鑲嵌在提籃橋的日常生活，再對照當年參與的襲產專家評語，益發凸顯提籃橋歷史風貌保存之困境。

從我這種保護的角度出發，實際上要考慮它的運作，一個操作性。永遠不可能說：就保護，就這區域範圍內作保護的。因為任何一個要作操作的，他必須要投入嘛，不管怎麼樣，經濟上的投入，要嘛就說你拿出四十個億來，我不管什麼，就作這保護，那也不可能。政府也沒那麼多錢。你如果一旦要引入企業作這事，他肯定會想我的投資回報，什麼樣的。必須要有一個經濟上的可操作性，你帳沒辦法算，事就沒辦法做了。加上後來這地價越來越高，所以就越來越沒法作了。然後住在裡面的居民，他又不出來，他又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對吧？只能就在螺螄殼裡做道場，反正就在裡面弄弄弄弄弄。（訪談陳麗人，2018/10/20）

於是，多年來的歷史風貌區範圍內的居民盼望動遷未得，同時，他們多半不清楚近年申遺轉向的發生，遑論理解轉向後的影響變化。在 2018 年十二月起因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擴建項目而執行的單邊里弄（長陽路 54 號、56 號，50 弄 1-31 號共約五十個單位）已動遷完，這動遷讓不少周邊居民重燃期望，以為申遺工作相關的保存動遷終於要重啟。這期望讓他們開始猜想出現於提籃橋的年輕研究助理或博物館志工，有可能是來處理動遷工作的。

那時候居民反而問我們說：你不是摩西會堂的嗎？我們這會不會拆遷？拆遷的話每個會補助多少錢？因為好像是市政府……，風聲已經傳了至少兩年了。（訪談 Brill，2019/11/16）

多數居民不知這有限小規模動遷只是為了促進世界記憶申請，也不清楚世界記憶項目和世遺目標、規模及影響大大不同——即便早年參與建築保存的襲產學者也未必清楚，在模糊的誤解中，居民重燃的過度期望很可能又將落空（圖十四）。



圖十四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擴建項目
（圖片來源：本研究 2019/2/16 拍攝於長陽路 50 弄巷內）

五、結論

探究發動於上海虹口區提籃橋一帶的中國猶太襲產，本研究關心「世界記憶」在東亞工具化過程的當代意義、地緣政治如何動員檔案襲產，回頭又影響了物質襲產的特定保存策略，重塑都市襲產保存及相關文旅策略發展。本研究所關注的上海猶太人難民襲產案例的成案歷程和行動邏輯，足為一特殊有趣的案例，如果終究登錄成功，可能帶動更多相似案例。在此例中，重訪的猶太人帶動了外事宣傳部門創設紀念館，事實上先於任何館藏的實質蒐集。而後十多年，紀念館開始有意識地蒐集資料、邀請捐贈來擴充館藏，同時逐漸開始醞釀申遺條件和評估申遺可行性，展開文件遺產和物質遺產之間的探戈舞。

本文基本上同意襲產研究學者 David Lowenthal 生前再三提出「襲產不是歷史，襲產是人們從歷史中尋求可能，進而得以創造良好感覺（之論述實踐）」。²²從上海的猶太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襲產製作過程中，我們追蹤地方政府和特定部門推動襲產化的過程，發現猶太襲產的普世主義性格，確實讓不同行動者有不同動機推動，城市外事單位看見了以襲產論述外交策略的潛力，而看重發展的區政府則看見了猶太難民曾寄居而後留下的建築群有其特定意義，能給提籃橋地區多添增寰宇記憶，替換原來此區的鄉野氣息。以提籃橋監獄的案例來看，「世界記憶」所涉不需動用太多修復或重建工程，似乎巧妙地解決了上海舊市中心動遷所費不貲的問題，然而，此案例要申請世界記憶，需要動員猶太難民經驗作為普世化記憶，且必然涉及猶太人離散記憶的襲產本身的困難襲產性質、對外性質，以及襲產主權相關，實難為一國所壟斷。近年中日嘗試提出不同論述更加深了此案例作為記憶戰爭的前線交鋒特質，讓都市脈絡中的襲產空間政治更為困難（Huang and Lee 2020）。我們或許就不意外此案例自制定歷史風貌保存區十五年以來持續遭遇挑戰，在無法順利導入想像中的猶太資本後，逐漸由世界襲產走向「世界記憶」之轉向，且即便如此，有關襲產主權的問題是否能藉由轉向世界記憶而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如果目前操作沒有朝向更為關係性的操作（Wang 2019），持續只是由中、日各說各話，很難樂觀地展望更具有批判國族主義意識的共融對話合作之可能性。

不過，由此「世界記憶」轉向所引動的襲產保存及發展，應能為襲產保存研究、文化導向都市再生相關貢獻重要的嶄新經驗研究，而這部分的討論也由此凸顯了襲產實踐操作落於空間劃定時，無可避免納入其他襲產價值考量、可行性評估，而終至切斷了歷史空間關係。2003年以降的風貌區劃定和原先上海猶太人的居住地原來遍布全市、1930年代之後逐漸集中於虹口、乃至於1942年之後日本劃設了無國籍者隔離區，範圍都不相同，呼應了Rugkhan(2015)指出歷史保存實踐為一「繪製歷史性的動作」，而非超然客觀存在。於此，我們可見以有形襲產為重的固著空間邏輯，未必完全貼合以人本記憶為重的移動經驗邏輯。

世界記憶的提報競賽—中日如何競爭於上海猶太難民記憶檔案襲產化—仍持續，有待未來研究追蹤，值得進一步比較此個案和東亞其他世界記憶提報實踐。本研究限於時間而留待未來深究課題仍不少，例如提籃橋監獄保存的遲滯不前、中國的猶太建築襲產圖像（不限於上海，哈爾濱也有不少重要建築）和國際保存倡議的政治、影像再現如何再製猶太難民記憶及相關跨國論述時見等等，都值得再深入發展為未來研究。最後，此一襲產化轉向過程持續排除居住於其中的居民，多數成為略顯尷尬的旁觀者，而他們自己的期待動遷離開，同時也加深了其起居日常和襲產化之疏離，這恐怕是最困難、也最容易在時光流逝過程中持續被忽略的一題。

致謝

感謝科技部計畫經費支持本研究完成所需之移地研究《監禁再造：東亞殖民監獄地景之重構、再生與再現》（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6/8/1-2017/7/31，105WFA0152078），同時，協助移地調查的助理群共同完成研究基礎資料，如註解所列不再重複。十分感謝多位熟悉上海都市歷史及文化保存的學者不吝協助，尤其是阮儀三、朱昱杰、潘律、蘇智良、陳祖恩等專家。更感謝提籃橋一帶居民、猶太難民紀念館相關人士慷慨分享其所知所感，當然，任何分析及詮釋文責自負。

附註

1. 除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UNESCO World Heritage）之中譯採「遺產」已行之有年，本文採取「襲產」來翻譯指稱英語 Heritage，以「襲產化」來稱 Heritagization，以求更具包容性的涵攝制度性定義之內和之外（both authorized and unauthorized heritage）、承襲而來具有價值意義而值得保存之事物，指涉超越既有制度指定或登錄範疇，以臺灣案例來說，不限於文化資產法定義的文化資產，在日本則不限於文化財，在中國政策脈絡中則不限於文化遺產。
2. 四次田野調查時間分別於 2018 年八月、2018 年十月、2019 年二月及 2019 年十月進行，歷次參與者包括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王瑤、張皓鈞（第二作者）、蘇靜純。每次時間不等，短則四日長至十二日。
3. 筆者曾受邀於 2018 年出席東京舉辦的 Voices of the “Comfort Women” Symposium，即為提案團體為了促進對話而舉辦的國際論壇（2018/11/9-11）。
4. 截至目前全球設立五處世界記憶計畫學術中心，分別位於澳門、北京、韓國、福建、蘇州。中心設立後以宣傳推廣世界記憶專案為目標，組織開展相關專案進校園等活動，開發檔案文獻襲產相關課程，積極發展檔案文獻襲產與世遺以及非遺項目的協同合作，<http://www.saac.gov.cn/daj/lhgjk/201811/8f8b2d7dd72c456f99c5c6865d97ecf0.shtml>。
5. 2002 年上海市頒布《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築保護條例》，2003 年九月十八日批覆同意上海市規劃局提出之《上海市中心城歷史文化風貌區範圍規劃》，共劃定十二個歷史文化風貌區，總面積約二十七平方公里。虹口區提籃橋歷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史文化風貌區是面積最小者。

6. 有時譯作碎玻璃之夜（德文為 Kristallnacht），代稱 1938 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凌晨，納粹黨員與黨衛隊襲擊德國全境猶太人事件。
7. 早先上海既有猶太社群曾研議不同方案，提出將猶太難民安置於滿洲國的計畫，時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孫科也曾提出安置猶太人至中國西南，後來皆未執行，本文礙於長度無法深入討論，可參考 Ristaino 2001: 96-97, 116-118。
8. 原以英語通信，此處為作者翻譯，徵得其同意公開具名引用。
9. 根據對研究者 Brill 的訪談（2019/11/16）得知，摩西會堂在成為紀念館前，曾被官方作為精神病院使用。但這段歷史未於紀念館正式公開訊息中提及。
10. 2018 年初起，提籃橋街道名稱正式撤銷，由「北外灘街道」取代，其管轄範圍東至大連路、秦皇島路，西至河南北路，南至蘇州河、黃浦江，北至海寧路、周家嘴路。四川北路街道海寧路以南區域也劃入北外灘街道。
11. 含外灘歷史文化風貌區（和黃浦區共有）、山陰路歷史文化風貌區、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等三處歷史文化風貌區，以及上海郵政總局大樓、上海大廈（原名 Broadway Mansions，大廈高 21 層，外灘建築群之一）、魯迅墓和提籃橋監獄等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2. 參考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2016）發布之規劃綱要。
13. 本研究團隊於 2018 年訪談了阮儀三等保存專家，對其當年規劃要旨有所掌握，可惜他們自相關單位退下後未有報告副本收藏，而原單位同濟大學建築系所屬學院圖書資料收整有所遺漏，遍尋不著該報告書。
14. 在同有猶太襲產的哈爾濱近年亦有類似作法，再現記憶而帶動了一連串的襲產保存（再利用猶太會堂為弦樂表演廳）、古典音樂園區等等。
15. 相關電影例如 2016 年上映的 *Persona Non Grata*（電影名稱應斜體），Cellin Gluck 執導，日本東寶出品。
16. 中國官方回應請參考，石寶珍〈關於加快推動上海猶太難民檔案文獻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做好民間外交向世界弘揚和平友善包容的建議〉，上海政協提案（2019/3/27）。
17. 同前。

18. 本團隊透過曾協助參與該團隊的上海學者而得知此製作，以及該學者最後因顧慮政治敏感性選擇退出該製作。該片資訊可參考拍攝計畫連結，https://marylka-project-english.amebaownd.com/pages/1698481/page_201802271433。
19. 參考上海市人民政府（2017/11/9）。
20. 中國公房租賃體制雖然類似於臺灣「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但前者是建基於共產體制、國有企業職員福利與國家對城市發展與戶口的控管上，其意義與後者有明顯差異。
21. 「原生態」脫胎自文化生態學，以生態系模型解釋自然、人文、社會所構成的文化系統。在 2006 年中國中央電視臺舉辦「青歌賽」時增加以民俗歌曲為主的原生態組別，讓「原生態」成為通俗媒體語言，「原生態」一詞隨中國鄉村建設風潮轉而指涉文化系統所需的適當生存環境。
22. David Lowenthal “Heritage is not history: heritage is what people make of their history to make themselves feel good.” Quoted from Hans Renes, October 13, 2018, <http://heritagestudies.nl/?p=347>。(查詢日期：2019/12/10)

參考書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

- 2017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關於堅持留改拆並舉深化城市有機更新進一步改善市民群眾居住條件的若干意見》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方網站 11 月 9 日，<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2404/nw42928/nw42929/u26aw54885.html>，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上海市文物局

- 2019 〈對市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第 0549 號提案的答覆〉。「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上海市廣播電視局、上海市文物局」官方網站 6 月 27 日，<http://wgj.sh.gov.cn/node2/n2029/n2031/n2388/u1ai158741.html>，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

- 2016 〈虹口區文化發展規劃綱要〉。<https://reurl.cc/R4nZe6>，2020 年 3 月 27 日上線。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王健

2008 《上海猶太人社會生活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

2018 〈世界記憶項目蘇州學術中心正式揭牌“錦瑟萬里 虹貫東西”絲綢之路歷史檔案文獻展在蘇州展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官方網站 11 月 26 日，<https://www.saac.gov.cn/daj/lhgjk/201811/8f8b2d7dd72c456f99c5c6865d97ecf0.shtml>，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石寶珍

2019 〈關於加快推動上海猶太難民檔案文獻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做好民間外交向世界弘揚和平友善包容的建議〉。上海政協提案 3 月 27 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5368/node5376/node5388/u1ai103593.html>，2020 年 3 月 27 日上線。

李佳佳

2007 〈以色列企業捐款上海 感謝二戰時接納猶太難民〉。《中新社》6 月 7 日，<https://reurl.cc/WdEvb7>，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朱淵、江妍

2017 〈“中國製造”《猶太人在上海》亮相以色列〉。《新民晚報》3 月 31 日，<http://wap.art.ifeng.com/?app=system&controller=artmobile&action=content&contentid=3290040>，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許曉青、孫青

2015 〈上海虹口啟動“申遺”：猶太難民史料計劃申報“世界記憶遺產”〉。《新華網》2 月 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03/c70731-26501781.html>，2020 年 3 月 26 日上線。

馬克·奧尼爾

2018 《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Israel and Chin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Silicon Wadi)。程翰譯。香港：三聯書店。

張艷華

2006 《提籃橋：猶太人的諾亞方舟》。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張艷華、王健

2011 《空間·故事·上海猶太人：提籃橋的過去與現在》。南京：譯林出版社。

張艷華、衛明

2007 〈“特質城市遺產”的保護—以上海市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為例〉。《城市規劃學刊》2007(06)：90-93。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黃宗儀、董牧孜

2017 〈從「小城青年」到「新上海人」：《小時代》與大都會「新中產」之自我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6：43-87。

黃舒楫

2014 〈監禁的記憶：殖民監獄博物館中的展／禁空間〉。《博物館與文化》8：69-107。

楊友仁、張智惠

2003 〈後社會主義城市空間再結構：上海太平橋地區舊城改造個案研究〉。《都市與計劃》30(2)：109-144。

詹水芳、齊峰

2013 〈上海老舊公房管理與運營機制研究〉。《科學發展》7：77-83。

劉曉航

2014 《流散中國的猶太人》。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蔣迪雯

2020 〈上海舊改計劃不變，鼠年首個舊改基地啟動第二輪方案徵詢〉。《上觀新聞》3月8日，<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221725>，2020年3月26日上線。

鄭鈞天

2019 〈“5G 全球創新港”亮相上海北外灘〉。《新華網》9月10日，<https://reurl.cc/R46yk9>，2020年3月26日上線。

羅曉媛

2019 〈華裔博物館「安全港灣：上海」展猶太人華人二戰情誼〉。《世界日報》11月5日，<https://reurl.cc/GVdKNA>，2020年3月26日上線。

Abid, Abdelaziz

- 2011 Preserving and Sharing Access to Our Documentary Heritage. Information Society Division, UNESCO.

Agnew, John

- 2005 Sovereignty Regimes: Territoriality and State Authority in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5(2): 437-461. doi: 10.1111/j.1467-8306.2005.00468.x

Beaumont, Joan

- 2016 The Diplomacy of Extra-territorial Heritage: The Kokoda Track, Papua New Guin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5): 355-367. doi: 10.1080/13527258.2016.1153496

Boyle, Edward

- 2019 Borders of Memory: Affirmation and Contestation over Japan's Heritage. *Japan Forum* 31(3): 293-312. doi: 10.1080/09555803.2018.1544582

Bunzl, Matti

- 2003 Of Holograms and Storage Area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at Vienna's Jewish Museum.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4): 435-468. doi: 10.1525/can.2003.18.4.435
- 2005 Between Anti-Semitism and Islamophobia: Some Thoughts on the New Europe. *American Ethnologist* 32(4): 499-508. doi: 10.1525/ae.2005.32.4.499
- 2007 *Anti-Semitism and Islamophobia: Hatreds Old and New in Europe*.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Eber, Irene

- 2008 *Voices from Shanghai: Jewish Exiles in Wartime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181684.001.0001

González, Pablo Alonso

- 2014 From a Given to a Construct: Heritage as a Commons. *Cultural Studies* 28(3):

359-390. doi: 10.1080/09502386.2013.789067

Handler, Richard

- 1987 *Heritage and Hegemony: Recent Works on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0(3): 137-141. doi: 10.2307/3317633

He, Shenjing

- 2007 *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43(2): 171-198. doi: 10.1177/1078087407305175
- 2010 *New-Build Gentrification in Central Shanghai: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5): 345-361. doi: 10.1002/psp.548

He, Shenjing, and Fulong Wu

- 2005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7(1): 1-23. doi: 10.1111/j.0735-2166.2005.00222.x
- 2009 *China's Emerging Neoliberal Urbanism: Perspectives from Urban Redevelopment.* *Antipode* 41(2): 282-304. doi: 10.1111/j.1467-8330.2009.00673.x

Heaney, Michael

- 2016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Alexandria: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ssues* 26(1): 46-55. doi: 10.1177/0955749016629035

Heppner, Ernest G.

- 1993 *Shanghai Refug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Honig, Emily

- 1992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Shu-mei, and Hyun-kyung Lee

- 2020 *Heritage, Memory, and Punishment: Remembering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Jakubowicz, Andrew

- 2009 *Cosmopolitanism with Roots: The Jewish Presence in Shanghai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as Brand in the New Metropolis*. In *Branding Cities: Cosmopolitanism, Parochialism, and Social Change*.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Eleonore Kofman, and Catherine Kevin, eds. London: Routledge, 170-185.

Jenkins, Gwynn

- 2009 *Contested Spac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s: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within a Developing Asian City*. Münster: LIT Verlag.

Jordan, Lothar

- 2013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Its Beginnings in 199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Gwangju Metropolitan City, June 18-21.

Kanno, Kenji

- 2018 *Where but Into the Sea*. https://marylka-project-english.amebaownd.com/pages/1698481/page_201802271433, accessed March 26, 2020.

Kuus, Merje

- 2020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Bound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6): 1185-1193. doi: 10.1177/0309132519869457

Leutloff-Grandits, Carolin

- 2006 *Claiming Ownership in Postwar Croatia: The Emotional Dynamics of Possession and Repossession in Knin*. In *Postsocialism: Politics and Emo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ruška Svašek, ed. Pp. 115-137.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Levy, Daniel, and Natan Sznajder

- 2002 Memory Unbound: The Holoca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Cosmopolitan Memo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5(1): 87-106. doi: 10.1177/13684310222225315
- Lowenthal, David
-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523809
- Macdonald, Sharon
- 2013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203553336
- Malek, Roman
- 2000 *From Kaifeng to Shanghai: Jews in Chin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doi: 10.4324/9781315093833
- Mandel, Ruth
- 2008 *Cosmopolitan Anxieties: Turkish Challenges to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rtínez, Plácido G.
- 2017 Urban Authenticity at Stake: A New Framework for Its Defi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itage at the Shanghai Music Valley. *Cities* 70: 55-64. doi: 10.1016/j.cities.2017.06.017
- Meskill, Lynn
- 2014 States of Conservation: Protection, Politics, and Pacting within UNESCO's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7(1): 217-243. doi: 10.1353/anq.2014.0009
- 2015 Transacting UNESCO World Heritage: Gifts and Exchanges on a Global Stage. *Social Anthropology* 23(1): 3-21. doi: 10.1111/1469-8676.12100
- Nakano, Ryoko
- 2018a A Failure of Global Documentary Heritage?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and Heritage Dissonance in East Asia. *Contemporary Politics* 24(4): 481-496. doi:
10.1080/13569775.2018.1482435

2018b Heritage Soft Power in East Asia's Memory Contests: Promoting and Objecting to
Dissonant Heritage in UNESC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17(1):
50-67.

Pan, Lu

2015 Remembering the Pain of "Others": Reflections on the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Museum and Beyond. *Writing the War in Asia - A Documentary History*.
https://www.polyu.edu.hk/cc/images/Article/Doc/paper/dissertation/panlu/06_dissertation_PanLu.pdf, accessed March 26, 2020.

Peleg, Bar

2020 Chinese Embassy in Israel on Coronavirus: We Opened Doors to Jews in Holocaust,
Don't Shut Them on Us (February 2, 2020). *Haaretz*, <https://reurl.cc/Qd7ZNo>,
accessed March 26, 2020.

Peleggi, Maurizio

2005 Consuming Colonial Nostalgia: The Monumentalisation of Historic Hotels in Urban
South-East Asia.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6(3): 255-265. doi: 0.1111/j.1467-8373.20
05.00289.x

Pendlebury, John, Yi-wen Wang, and Andrew Law

2017 Re-using "Uncomfortable Heritage": The Case of the 1933 Buildi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4(3): 211-229. doi: 10.1080/13527258.2017.1
362580

Prasso, Sheridan

2004 Salvaging Jewish Heritage in China, Block by Block (May 31,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4/05/31/arts/salvaging-jewish-heritage-in-china-block-by-block.html>, accessed March 26, 2020.

Renes, Hans

- 2018 David Lowenthal 1923-2018 (blog), October 13. <http://heritagestudies.nl/?p=347>,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9.

Ristaino, Marcia R.

- 2001 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ugkhaman, Napong T.

- 2015 Mapping the Historic City: Mapmaking, Preservation Zoning, and Viol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5): 869-888. doi: 10.1177/0263775815604916

Sloggett, Robyn

- 2005 Valuing Significance or Signifying Value? Culture in a Global Context.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33(2): 110-129.

Steger, Isabella

- 2020 China's Holocaust Comparison for Israel's Coronavirus Border Closure Isn't Just Offensive, It's Inaccurate (February 3, 2020). Quartz, <https://qz.com/1795806/china-compares-israel-coronavirus-controls-to-holocaust/>, accessed March 26, 2020.

Suh, Kyung-ho

- 2020 History Wars in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The Document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the "Comfort Women". *In*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Pp. 91-107. Cham: Springer. doi: 10.1007/978-3-030-18441-4_7

Tobias, Sigmund

- 1999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i, Albert Wing Tai

- 2006 Place Promotion and Iconography in Shanghai's Xintiandi. *Habitat International*

黃舒楣、張皓鈞·

上海猶太襲產保存的記憶轉向與跨域協商：普世化記憶、襲產外交及城市空間政治
30(2): 245-260. doi: 10.1016/j.habitatint.2004.02.002

Wang, June

2019 Relational Heritage Sovereignty: Authorizatio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ilk Roads.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7(2): 200-216. doi:10.1080/21622671.2017.1323004

Wang, Yu

2017 The Myth of “Shanghai Ark” and the Shanghai Jewish Refugee Museum. *University of Toronto Journal of Jewish Thought* 6: 107-130.

Wu, Fulong

2003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ffairs* 25(1): 55-78. doi: 10.1111/1467-9906.00005

Yang, Daniel You-ren, and Chih-hui Chang

2007 An Urban Regeneration Regi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Shanghai’s Taipingqiao Area. *Urban Studies* 44(9): 1809-1826. doi: 10.1080/00420980701507787

Zhang, Tingwei

2002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37(4): 475-499. doi: 10.1177/10780870222185432

Zhong, Xiaohua, and Xiangming Chen

2017 Demolition, Rehabil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Heritage in Shanghai’s Urban Regeneration, 1990-2015.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41(2): 82-91. doi: 10.3846/20297955.2017.1294120

